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 與香港的機遇和挑戰

研究報告

2024年10月



目 錄

行政摘要	1
前言	6
政策篇	8
一、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戰略佈局	9
1.1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戰略背景	9
1.2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定位	10
1.3 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目標	11
二、 大灣區合作的發展情況	12
2.1 大灣區整體發展情況	12
2.2 主要城市的產業佈局	14
2.3 三個國家級粵港合作平台的發展情況	15
2.3.1 前海	15
2.3.2 南沙	18
2.3.3 河套	19
三、 香港把握大灣區未來發展機遇的策略	21
3.1 與「北部都會區」規劃的戰略聯動	21
3.2 為「新型工業化」增量賦能	22
3.3 於「黃金內灣」合作開發新型深度合作區	22
3.4 創設香港特區政府投資公司與內地共投共管模式	23
3.5 設立先進製造業「CEPA拓展園區」	24
3.6 合作打造高端旅遊休閒項目	26

企業篇	29
四、大灣區企業發展觀察	30
4.1 大灣區企業發展現狀	30
4.2 大灣區企業戰略發展挑戰洞察	30
4.2.1 營商環境跨域協同與國際化提升挑戰	32
4.2.2 稅務政策合規與差異化管理挑戰	33
4.2.3 人才引聚與個稅優化管理挑戰	34
4.2.4 企業科創激勵策略挑戰	36
4.2.5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全球資金管理新挑戰	37
4.2.6 高水平對外開放企業出海挑戰	38
4.2.7 大灣區產業協同，資源優化挑戰	38
4.2.8 跨境流動新挑戰與合規挑戰	39
五、大灣區企業發展戰略指南	41
5.1 構建國際化營商環境典範，激發市場活力與創造力	42
5.2 優化稅務策略，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	43
5.3 強化人才戰略，打造灣區人才高地	44
5.4 精準財政補貼，助力產業升級與創新	44
5.5 靈活跨境資金政策，促進資本自由流動	44
5.6 佈局全球出海戰略，拓展國際市場版圖	45
5.7 深化灣區產業協同，構建協同發展新生態	45
5.8 保障資料安全，暢通資料跨境流動渠道	46
結語	49

行政摘要



前言

1. 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關鍵舞台。這片具有獨一無二的「9+2」城市群格局的區域，以其無與倫比的開放程度與經濟活力，傲立於中國經濟版圖之上，成為推動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2.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統籌規劃。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於2019年正式發布以來，一系列創新政策與合作機制得以落地實施，不僅為大灣區注入了強勁的發展動力，也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區內企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
3. 在《規劃綱要》發布五周年之際，香港中華總商會聯同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撰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與香港的機遇和挑戰》研究報告。一方面，透過整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梳理過去五年的整體發展情況，掌握政策指導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走向，從戰略規劃視角提出政策建議。另一方面，梳理大灣區企業主體的發展現狀，結合案例總結關鍵領域的發展難點，提出富有前瞻性與實用性的大灣區企業發展戰略指南。

政策篇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戰略佈局

4. 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規劃，「大灣區」概念的形成與發展具有獨特時代背景，當中有三個重要的時代特點：一是配合國家新時期發展的戰略需要，作為推動經濟創新性發展的「策源地」；二是承接國家有關城市化規劃的模式，形成具有「灣區」特色的優質城市群；三是作為紓解港澳發展所面臨的內部深層矛盾的手段，促進人心回歸。
5. 大灣區規劃的戰略定位在層次上高於原來的「大珠三角城市群」，要成為對標紐約灣區、東京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的全球產業核心區、引領區。大灣區的目標不僅僅是在經濟規模上達到或超過這些灣區，更重要的是成為世界經濟分工體系制高點的位置。
6. 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特點在於「一國兩制」的存在，「一個灣區、兩種制度、三個獨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形成多重疊加效應。與此同時，不同區域、制度間的隔閡也造成了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等生產要素流動和協調上的困難；因此，透過更好的協同協作機制，充分發揮「兩制」疊加優勢，是大灣區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灣區的重點。
7. 大灣區的戰略目標有三：一是促進高水平的產業協同，佔據國際產業鏈的高位。二是促進「一國兩制」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三是促進融合發展，建設大灣區共同生活圈。

大灣區合作的發展情況

8. 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包括4個中心城市及7個重要節點城市）分擔不同的功能。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為大灣區的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發揮比較優勢做優做強，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為大灣區的節點城市，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深化改革創新，增強城市綜合實力，形成特色鮮明、功能互補、具有競爭力的重要節點城市。
9. 隨著大灣區規劃的工作推進，各市逐漸形成優勢互補的功能定位。目前，香港、澳門以第三產業為主，三產佔比均在90%以上；廣州、深圳呈現典型的「三二一」型產業結構，第三產業佔比突出；東莞、珠海、江門、中山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佔比相差不大；惠州、佛山、肇慶第二產業佔據主導地位。
10. 為探索粵港合作新模式，推動產業優勢互補以及主要合作區域和重點領域的體制機制創新，目前已有三個國家級粵港合作重大平台（前海、南沙、河套），三個平台有各自的不同使命，因此在任務安排、政策突破方面有差別化設計，形成戰略互補。

香港把握大灣區未來發展機遇的策略

11. **與「北部都會區」規劃的戰略聯動：**「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意義不止在於促進香港經濟及產業發展，更在於突破香港規劃的空間概念，透過地緣優勢加強與深圳的協同，促進深港合作。香港要更進一步把握大灣區發展的機遇，對接大灣區發展戰略，關鍵在於更有效地善用大灣區的各類要素。就此需要一個更靠近大灣區中心的「戰略性發展功能區」，作為在大灣區的重要布點，強化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的角色。
12. **為「新型工業化」增量賦能：**以創新科技為核心，先進製造為主體的「新型工業化」，已成為香港未來產業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香港的新型工業化策略須將科技研發和工業製造分成兩個產業鏈的不同端，讓大規模的生產環節落地在大灣區其他城市，彌補香港覓地困難和租金成本高等問題，實現產業整合發展，共同推動大灣區先進製造業協同發展的工業生態。
13. **於「黃金內灣」合作開發新型深度合作區：**香港以創新科技為核心的發展戰略需要與內地城市加強深度合作。現存的三個主要粵港合作平台（前海、南沙、河套）存在合作領域空白、協作治理經驗均有可以完善之處的問題，還需要更加高效的措施推動灣區之間城市協作。就此，香港可與大灣區的黃金內灣區域開展合作，選址包括東莞濱海灣新區、中山翠亨新村，打造新時期粵港合作重大平臺。合作平台除發揮自身的區位與產業優勢外，也要體驗香港在協作治理上的積極參與，發揮規劃戰略優勢，把握與其他平台的聯動協作潛力。
14. **創設香港特區政府投資公司與內地共投共管模式：**建議參考中國和新加坡合作的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由香港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內地政府企業合作投資和共同管理，以加強深度合作，運用「大灣區投資基金」參與「粵港新型深度合作區」投資開發及建設營運，並享有新區後續發展收益。
15. **設立先進製造業「CEPA拓展園區」：**香港由於欠缺製造業基礎，目前尚未充分發揮CEPA零關稅政策的優惠。就此，建議於現有的合作區內設立「CEPA拓展園區」，把CEPA中「香港」原產地的定義延伸到合作區裡的特定空間。一方面，原材料可以免稅進入該區，另一方面，在區內進行的生產，都算作「香港」的區域價值，使得產品可以享受CEPA下的零關稅。
16. **合作打造高端旅遊休閒項目：**依托大灣區的獨特地理條件，加之香港擁有豐富的遊艇項目管理經驗，建議進一步推動香港與內地城市合作打造優質遊艇航行旅遊項目，並且推動遊艇自由行的落實。

企業篇

大灣區企業發展及挑戰

17.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近年來在企業增量、價值創造和產業分佈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與此同時，目前大灣區各城市發展仍面對幾大難點：服務化趨勢不明顯、產業結構同質化、外向型經濟特徵明顯、創新能力不足、研發投入不足。因此，如何精準定位自身發展路徑，構建核心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大灣區企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本報告研究團隊走訪了大灣區內多家極具代表性的企業，細緻剖析了這些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獨特機遇，同時也揭示了它們所遭遇的複雜挑戰。**
18. **營商環境跨域協同與國際化提升挑戰：**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政策導向明確、數字化轉型加速、法治保障強化、人才爭奪激烈等多元背景下，大灣區企業在營商環境優化上正面臨著挑戰。主要表現在：規則銜接與協調困難；跨境資金流動與融資困難；跨境貿易與物流便利度較低；粵港澳三地信息共享建設仍未成熟，存在信息不對稱與溝通障礙問題；大灣區城市之間發展差異較大。
19. **稅務政策合規與差異化管理挑戰：**廣州南沙、珠海橫琴、深圳前海、深圳河套的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備案管理採取「自行判別、申報享受、相關資料留存備查」方式，如果出現稅務籌劃不當的情況下，企業將面臨稅務調整或處罰，這帶來企業稅務合規化的挑戰。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包含三種不同的行政體制（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以及不同區域的稅制，稅制的差異性，增加了企業稅務管理工作的難度。

20. **人才引聚與個稅優化管理挑戰**：經過企業調研，我們觀察到大灣區企業享受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時面臨著以下需求或難題，包括提升對個稅優惠政策的解讀與應用，為港澳與外資員工提供最優的個稅方案；建立更為合理的稅務籌劃和行之有效的監督管理手段，避免因稅務問題而引發的風險。
21. **企業科創激勵策略挑戰**：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實施了一系列針對高新技術企業的補貼和財稅優惠政策，目前企業科創激勵面臨三方面挑戰。一方面優惠政策落實門檻較高，一些企業雖然已擁有核心技術知識產權，但由於研發費用總額佔收入比例不符合規定要求，未能享受到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另一方面申報流程複雜、資料準備繁瑣等問題。此外，大灣區內的企業為了爭取當地適用的優惠政策，可能會產生知識產權和科研人才的所在地之間「二選一」的矛盾和障礙。
22.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全球資金管理新挑戰**：根據2023年中國100大跨國公司名單，上榜14家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的海外資產共計2.3萬億元人民幣。這一背景下，如何高效管理境外資金，特別是全球資金的優化配置，已成為企業普遍關注且亟待解決的議題。總體而言，這些挑戰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大類別：風險大、效率低、融資難。
23. **高水平對外開放企業出海挑戰**：報告觀察到，企業在海外擴張的征途上，於規劃、執行和運營三大阶段遭遇了七大核心挑戰：目標市場定位不夠清晰、市場進入策略選擇困難重重、行動進度難以有效掌控、海外運營協同機制尚待完善、供應鏈規劃缺乏整體考量、合規風險持續上升、以及數字化管理效果亟待提升。
24. **大灣區產業協同，資源優化挑戰**：目前大灣區的產業體系主要依靠以投資驅動為主導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可能導致主導企業佔據部分市場資源阻礙科技產業全面高質量發展。此外，大灣區各城市科創要素發展不均衡，如何平衡區域科技創新資源也是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突出挑戰。
25. **跨境流動新挑戰與合規挑戰**：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數據已躍升為新型先進的生產要素，其跨境流動也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活動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是目前灣區內的跨境數據在安全、合規、有序、高效流動領域的成熟度尚有待提升。目前，粵港澳三地政府如何嚴格把控數據安全合規的要求以及數據從內地傳輸到港澳屬數據出境時，企業如何滿足合規要求且得到國際認可是亟需解決的難題。

大灣區企業發展戰略指南

26. **構建國際化營商環境典範，激發市場活力與創造力**：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大灣區企業需要構建一個全面且前瞻性的外部戰略框架，這一框架旨在不僅拓寬國際市場、深化國際合作，還要在國內政策紅利的支持下，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和產業的優化升級。此外，大灣區企業要想持續發展，內部實力是核心要素之一，企業應以數字化和人才為雙輪驅動，構建高效、智能、協同的內部運營體系。
27. **優化稅務策略，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在目前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企業稅務管理尤為重要。企業在落戶大灣區時，應該根據自身的定位結合大灣區內的產業特點進一步關注政府財稅政策的實質性運營細化指引，對企業的稅務管理進行籌劃。仔細對照稅務政策中優惠目錄所涵蓋的產業項目與企業的主營業務的匹配度情況，評估可享受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此外，企業應詳細考慮稅務管理規劃的落地實施相關問題，配備專家尋找稅務規劃落實中的風險點。
28. **強化人才戰略，打造灣區人才高地**：企業應立足企業的戰略定位，分析行業人才需求特點，結合政府的個稅優惠政策，建立匹配的人才戰略與稅務籌劃。此外，企業應該完善相應的內部政策輔助港澳、外資員工檢查個稅優惠收入及相關支持性文件的完成性，及時完成納稅調整。同時，企業應該對個稅優惠政策申報的內部流程管理進行優化和更新，還應定期向主管稅務機關了解具體申報要求並及時完成資料更新和報送。在此期間時刻關注實施過程中的風險，保證順利落地實施。
29. **精準財政補貼，助力產業升級與創新**：企業應加強對高新技術補貼政策的了解和利用程度，定期關注政策動態和申報指南的變化，在申報流程中注意確保符合相關要求以及時享受到最新的政策優惠。企業可以結合香港和內地在知識產權及科創方面的優勢，在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內各設立一家企業共同研發，其中一家公司持有且在大灣區內選擇一地登記知識產權時，兩地政府可將該企業一起認定該知識產權，可以在兩地都享受相關優惠。

30. **靈活跨境資金政策，促進資本自由流動**：在降低資金使用風險方面，通過將企業全球化公司賬戶的監督集中在香港，可使企業能夠改善其業務部門的財務治理，這是有效緩解各種金融風險的關鍵，包括流動性風險、資本安全風險和交易對手風險等；在降低稅務負擔方面，香港CTC符合相關規定，使用更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即8.25%（標準稅率為16%），此外，其向海外相關公司支付的利息可在特定條件下扣除；在提高資本效率和增加收入方面，在香港建立CTC使公司受益於香港穩定的外匯環境和美元匯率，降低借貸成本和外匯費用，提高資本效率和回報率。
31. **佈局全球出海戰略，拓展國際市場版圖**：為成功應對海外市場拓展的挑戰，企業需從七個核心方面進行全面規劃與佈局。一，進行目標市場與路徑的篩選，精準確定最具發展潛力的市場及最適宜的進入路徑。二，制定有效的營銷策略和渠道規劃。三，對項目進行全面評估，確保投資的高效落地，綜合考慮行業、地域、時間等因素，靈活調整投資策略。四，企業應精簡流程，強化稅務合規，關注稅務優惠，確保供應鏈涉稅事項的合規性。五，建立穩固的海外治理與管理體系，確保業務的安全穩定，並實現供應鏈風險的全生命週期管理。六，企業應構建覆蓋全鏈路的風險預警體系，有效管理海外供應鏈風險。七，企業應全面梳理風險傳導關係，進行多維度的風險評估，並據此制定有效的應對策略。
32. **深化灣區產業協同，構建協同發展新生態**：企業需要探索「技術+產業」的雙輪驅動模式，實現協同發展。技術方面，各地企業可聚力開展關鍵技術攻關、技術熟化、樣機開發等，為科研成果的轉化作出貢獻。產業方面，加強智能製造的應用，企業可建立健全標準化工作體系，把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運用在產業中，同時打造信息分享平台，實現大灣區各地的科技信息資源共享。在產業選址方面，企業首先要考慮地理位置以及交通便利性，還要考慮當地的產業基礎以及配套服務設施、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和合作機制。在供應鏈規劃方面，深圳的企業可以合理利用香港的國際化資源，增強供應鏈服務出海能力、建設大宗商品供應鏈體系等。在科研機構合作方面，深港兩地的科創企業可以建立項目管理溝通部門和成果分享平臺，促進企業間的合作和信息共享。
33. **保障資料安全，暢通資料跨境流動渠道**：大灣區企業需要時刻關注粵港澳三地政府在跨境數據安全合規方面的政策動態，積極與監管部門就數據出境的監管要求進行溝通，通過交流深化對數據跨境法規中關鍵概念及行業監管重點的認識，保證自身在進行跨境數據傳輸時符合監管要求。此外，多方面提升內部對跨境數據的治理水平，通過人員架構、制度建設、系統架構、自評管理等方面逐步提升內部對跨境數據的治理水平，確保數據的合規性和安全性，為企業的國際化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結語

34.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與香港關係最密切的國家戰略之一，是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平台。對於「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關鍵的是要理解何謂國家發展的「大局」，也就是國家發展戰略。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兩次提到「粵港澳大灣區」，作出了明確的指示：一是作為區域發展戰略，代表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區域之一，要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用；二是關於高水準對外開放，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35. 在大灣區過去五年的發展經驗中，企業不只是受益者，也是參與者、開拓者。政府層面制定了戰略規劃，設計了政策措施，但在落地協調方面，需要企業的對接推動。企業界在營商環境、產業升級壓力、稅收成本、人才政策配套、財政補貼激勵、跨境資金及數據流動、政策法規機制等方面，一邊在探路、一邊在開創，為我們建設了大灣區一體化的基本格局。未來隨著區域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企業一方面要把握政策紅利與市場機遇，另一方面要深刻洞察挑戰，予以恰當應對。
36. 「協作治理」是大灣區規劃的第二個五年的新關鍵詞。不論是產業分工，還是機制對接，大灣區在「2+9」的格局下，愈益需要加強不同制度之間的合作，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需要建立更緊密及有效的協作機制。除了政府之間的「G to G」協作外，政府與企業之間的「G to B」協作也是重要一環。

前言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關鍵舞台，其廣闊的地理範圍跨越了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省內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等九座活力四射的城市，共同構築了獨一無二的「9+2」城市群格局。這片區域，以其無與倫比的開放程度與經濟活力，傲立於中國經濟版圖之上，成為推動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回望過去，大灣區的建設歷程可追溯至2011年廣東省政府對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的遠見卓識，以國際一流灣區為標桿，為大灣區的藍圖勾勒出初步輪廓。隨著時間的推移，珠三角各城市紛紛響應，將融入大灣區建設視為發展的必經之路。2015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更是從國家層面明確了深化粵港澳合作的戰略方向，為大灣區的加速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

進入新時代，大灣區的發展步伐更加堅定有力。從「十三五」規劃的明確部署，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正式提出，再到習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的強調，大灣區建設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著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歷史使命。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發布，不僅為大灣區的長遠發展描繪了清晰的路徑與時間表，更標誌著大灣區建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五年來，一系列創新政策與合作機制的落地實施，不僅為大灣區注入了強勁的發展動力，也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區內企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

在《規劃綱要》發布五周年之際，香港中華總商會、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聯手撰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與香港的機遇和挑戰》研究報告。本報告旨在梳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歷史背景、發展現狀及未來展望，以及透過企業實踐經驗，深入分析當前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更積極融入大灣區發展戰略建言獻策，另一方面為有意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的企業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實用性的發展建議。

整份報告分為「政策篇」、「企業篇」兩大部份：「政策篇」先從宏觀形勢著眼，分析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要點，綜述過去五年的整體發展情況，並從戰略規劃視角提出政策建議；「企業篇」聚焦大灣區發展中的企業主體，梳理企業在大灣區建設過程中的經驗，歸納當中實際的機遇與挑戰，最後為企業提供如何在大灣區戰略中最好地發展的指南。在報告的分析內容中，我們適時加入相關案例，透過「由面到點」的方式，使讀者能對大灣區戰略及其落實有更為立體的理解。

我們相信，通過本報告的發布，能夠進一步激發社會各界對大灣區建設的關注與熱情，促進各方攜手並進、共創輝煌，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級的灣區經濟體，為中國乃至全球的經濟發展貢獻積極力量。

政策篇



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戰略佈局

1.1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戰略背景

要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作出長遠而正確的部署，必須從了解「大灣區」概念的形成與發展，探討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規劃的獨特時代背景，當中有三個重要的時代特點。

一是配合國家新時期發展的戰略需要。隨著經濟崛起以及綜合實力的提升，國家從全球經濟分工的參與者逐漸變成領導者的角色，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發揮引領作用。經過多年的持續快速發展，國家經濟發展邁入新常態，需要推動全面而深刻的結構性變革，尋求經濟發展新動能，當中包括推進工業升級，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製造業融合發展，從數量主導型向創新驅動型經濟轉型。因此，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將是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主導的新經濟模式，而推動經濟創新性發展需要一個「策源地」。

創新能力依托於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高水平的教育質量、高度集聚的創新人才。廣東省加上港澳特區不僅具有獨特的區位優勢，更具有改革開放和制度創新的先行優勢，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市場經濟體系較完善，國際經濟貿易聯繫密切，在全球產業分工鏈條中形成了持續上升的能力；作為國家經濟轉型的優選策源地之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國家新時期發展的戰略需要所驅動的。

二是承接國家城市群規劃的模式。從十一五規劃（2006-2010）開始，國家關於城市化的方針策略出現了明顯改變，明確了以城市群為主要載體，提出：「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國家規劃的城市群，是以一至三個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為核心，在半徑約300公里範圍內，形成一個由十幾個大中小城市共同形成的城市組合群。城市群間依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城際鐵路串聯起來，形成一小時至兩小時的生活圈，使城市群內部各區域間的發展相對平衡。這些城市群會成為未來中國城市化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來源，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重大推動作用，並重塑全球經濟增長方式和世界國際經濟格局的面貌。

在城市群分佈上，國家在十三五規劃（2015-2020）中提出：「優化城鎮化佈局和形態，構建以陸橋通道、沿長江通道為橫軸，以沿海、京哈京廣、包昆通道為縱軸，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佈、協調發展的『兩橫三縱』城市化戰略格局。加快城市群建設發展，增強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功能，加快發展中小城市和特色鎮。」在這種佈局下，粵港澳大灣區處於沿海軸線與京廣軸線交匯處具有其作為城市群的獨特優勢。「灣區」具有比一般沿海地區更優越的生態和區位，包括避風、水深和防凍等優點；由於灣區是共享的且由不同主體所共同佔有，不同主體可以依託灣區建設港口群，並形成多個不同功能的城市，從而形成相當規模的城市群。此外，在主要依賴水運的情況下，國內外產品主要通過灣區出入所連接的內河，然後再進出廣闊內陸腹地。對標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灣區經濟有著開放經濟的傳統，是中國南方的門戶和樞紐，而且該區域在改革開放歷史上有特殊地位，從八十年代開始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區域，也是最先發展和繁榮起來的區域。

三是作為紓解港澳發展所面臨的內部深層矛盾的手段，促進人心回歸。香港在回歸後的發展以繁榮穩定為重要方針，但難免面臨諸多內部的制約條件，包括土地成本高企、產業結構單一、社會流動不足，加上市民對生活的期望持續提高，形成深層次矛盾，單靠香港城市自身內部的機制難以解決。香港回歸後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若未有紓解，既不利於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也不利於一國兩制的持續實施。

就此，國家有意通過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疏導香港內部的經濟及社會壓力，紓解深層次矛盾，從而促進人心回歸。因此，大灣區規劃除了經濟因素外，亦有社會及政治層面的考量，使其成為國家戰略。對港澳來說，大灣區實際上也是國家重大支持，通過參與大灣區發展，有助港澳可以更好地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讓港澳居民一方面能夠享受到內地經濟發展的成果，在經濟結構和生活空間上得到擴展；另一方面依託大灣區的腹地來緩解產業結構狹窄和土地空間嚴重不足的困難，增強經濟動力，促進社會和諧。

1.2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定位

在掌握大灣區規劃的背景脈絡後，可以進一步理解其獨特的戰略定位。首先，雖然粵港澳大灣區在空間範圍上和傳統的「大珠三角」概念是基本一致的，但用了「大灣區」這樣一個新概念，在戰略層次上高於原來的「大珠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所要做的是對標紐約灣區、東京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的全球產業核心區、引領區。大灣區的目標不僅僅是在經濟規模上達到或超過這些灣區，更重要的是成為世界經濟分工體系制高點的位置。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是從全球座標謀劃競爭新優勢，希望透過超級海港、創新高地、金融功能和交通樞紐等幾大要素的優勢，充分發揮該地區在全球經濟核心區中的領導功能。

與傳統的「珠三角」城市群概念相比，大灣區更重視該區域的「海灣」概念，著重充分調動灣區的資源稟賦優勢。傳統的「珠三角」概念，是以珠江下游三角洲為基礎形成的城市群；但「大灣區」更強調的是外向型的「海灣」概念。灣區是由優良的海灣、海港、鄰近島嶼共同構成的沿海地帶，是超越城市行政邊界的空間，是形成大規模城市群的優質載體。灣區經濟依港而生、沿灣而興，具有天然的開放屬性；世界頂尖的灣區城市群經濟普遍發展水平高、競爭能力強，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世界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地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等世界三大灣區具有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等優勢，是世界500強、創新公司、研發資源和專利成果密集區，位於國際競爭力和創新能力高峰，也是推動國際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變革的重鎮。因此，大灣區規劃的戰略定位也在於要發揮粵港澳地區所匯集的科技創新高地、金融功能發達和交通樞紐等要素優勢，發展成為具有全球經濟領導作用的核心區。

與其他幾個世界灣區比較，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特點在於「一國兩制」的存在，稱為「一個灣區、兩種制度、三個獨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形成多重疊加效應。大灣區不但擁有一國兩制方針下的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自由港，而且還有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南沙、前海蛇口和橫琴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由此形成了包括特別行政區和自由港、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多重經濟體的體制疊加優勢和開放疊加形態，從而能夠產生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能量。此外，灣區範圍內如香港、深圳、廣州、東莞、珠海等多個港口形成「港口群」；也形成了不同的產業集群，包括通訊電子信息、新能源、人工智能、智能設備等高端產業集群，同時也有石油化工、服裝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飲料等中低端產業集群，形成「港口群」、「產業群」所組合而成的疊加狀態。基於諸多疊加效應，使得大灣區在創新發展、內外聯通的市場化、國際化層面都有獨特的潛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區域、制度間的隔閡也同時造成了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等生產要素流動和協調上的困難，因此，透過更好的協同協作機制，充分發揮「兩制」疊加優勢，是大灣區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灣區的重點。粵港澳大灣區的出發點之一，正是要解決生產要素流動便利化的問題，同時通過實踐來嘗試如何通過創新機制把「兩制」優勢疊加起來，發揮「1+1>2」的效果。就此，大灣區規劃的協調層級也有了明顯的提升。傳統大珠三角是廣東省與港澳、以及廣東省內部各個城市間，以各地政府為主體，簡單地將之區分為「9+2」的概念；而「大灣區」則是以地理空間為核心，是將其提高到國家層面，由中央政府主導，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作為具體落實者，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執行的國家戰略，是區域內推動一體化的產業群和共同的生活家園的概念，打破了各地政府各自為政的格局，發揮了「兩制」疊加的優勢。

1.3 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目標

基於上述的戰略定位，大灣區的戰略目標有三。

一是促進高水平的產業協同，佔據國際產業鏈的高位。隨著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粵港澳經濟發展水準、經濟結構和比較優勢的相對變化，粵港澳之間的經濟關係，由過去廣東接受香港、澳門輻射為主，如過去的前店後廠的「垂直分工」關係，變為粵港澳在不同產業上各有優勢、協同發展的「水平分工」的合作模式。廣東省以深圳為代表，擁有全國領先的科創產業，背靠中國腹地的資源；而香港則擁有國際化金融業資源以及全國優秀人才資源。因此，大灣區建設一方面要充分發揮香港的對外聯通功能，另一方面要發揮廣州、深圳等城市的要素匯聚功能，以香港帶動沿海，沿海帶動內陸，逐級推動、輻射帶動灣區經濟全面發展的核心作用，聯手成為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和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基地，實現產業經濟提升，進一步成為國家科技產業中心和金融業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地區。

大灣區經濟在香港港、深圳港、廣州港等眾多港口群的帶動下已經形成了高端產業集群及傳統產業集群並存的局面；但仍存在諸多問題，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不足、傳統產業過度集中在中低端環節，各地過度競爭、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因此，要做好大灣區的空間結構規劃，統籌形成分工合理、角色明確的發展結構，並重點在金融、創新科技、專業服務等三大領域，推動高水準的產業協同合作。透過對大灣區區域合作目標、理念、機制和方法的質變式飛躍，可有效提升大灣區經濟資源要素的統籌層次和水準，突破發展瓶頸和彌補資源短板，保持持續發展的向上趨勢，進而成為中國新經濟的驅動引擎。此外，要推動「官產學研」合作，加速產業融合的協調發展，開創綠色低碳的創新型先進製造業體系，提高創新活力，推動產業多元化升級。

二是促進「一國兩制」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的成敗亦在於對「兩制」揚長避短，充分利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格局，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探索經驗。另一方面，大灣區地處銜接「兩制」核心樞紐位置上，最有機會利用好兩種制度各自的優勢，發揮特殊的作用，在灣區資金、人員、貨物、訊息的流動方面起到示範作用，進一步消除城市群內部各類經濟要素跨境流動的障礙。因此，如何用好「兩制」優勢讓生產和生活要素在大灣區三個獨立關稅區下低成本跨境流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大灣區的戰略目標之一正是要推動要素的自由流動，借鑒國際上協作治理的成功經驗，打破行政區域壁壘，促進粵港澳跨境基礎設施全面對接。接下來，推動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大灣區發展的重要課題，要使大灣區成為「一國兩制」下要素自由流動的試驗田和全國新經濟發展的策源地。

三是促進融合發展，建設大灣區共同生活圈。為促進大灣區內不同城市的要素流通以及產業分工，交通基建等硬件、通關便利、生活配套等軟件的完善是不可或缺的。城市群的發展與就業和通勤息息相關，因此以交通基礎設施硬件支撐的通勤都會區，不僅是都市群的特質，也是都市群功能得以發揮的關鍵。灣區都市群高度重視節點建設，通過發展軌道交通造就新節點，節點由網絡組成，是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的中轉點、樞紐點，創造溢出效益和外部效益。

國際一流灣區基本都能形成一小時生活圈、經濟圈，公共交通的軌道網絡及相配的其他交通工具的配套體系是重中之重。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正在積極構建「一小時生活圈」，但在與市民息息相關的生活範疇仍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地方。就此，大灣區未來會在教育、醫療、福利、通訊、通關等社會民生領域探索創新突破，加強各類生活要素的互聯互通，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的便利流通，使大灣區真正形成緊密聯繫和高度國際化的城市群體。

二、大灣區合作的發展情況

2.1 大灣區整體發展情況

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佈局中，包括4個中心城市及7個重要節點城市，實施中心帶動、節點聯繫的區域發展戰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為大灣區的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發揮比較優勢做優做強，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為大灣區的節點城市，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深化改革創新，增強城市綜合實力，形成特色鮮明、功能互補、具有競爭力的重要節點城市。增強發展的協調性，強化與中心城市的互動合作，帶動周邊特色城鎮發展，共同提升城市群發展質量。

自《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於2017年7月出台以來，大灣區經濟規模總體保持平穩增長。整體生產總值自2017年的14,428億美元增長至2023年的19,868億美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約為5.48%。按地區劃分來看，2023年深圳、廣州、香港地區生產總值位列前三，分別達到4,890.9億美元、4,290.2億美元、3,820.8億美元。

表1：粵港澳大灣區各市主要發展指標(2023年)

城市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 (萬)	本地 生產總值 (GDP) [#] (億美元@)	人均GDP (美元@)	第三產業 佔GDP比重 (%)	出口 (億美元@)	實際利用 外商直接 投資 (億美元@)
粵港澳大灣區	~56,000	8,688	19,868.0	22,867	64.4	12,750.3	1,623.3
香港	1,114	750	3,820.8	50,705	88.7	5,335.8	1,407.0*
澳門	33	68	470.6	69,385	90.5*	16.5	4.8*
廣州	7,434	1,883	4,290.2	22,938	73.3	919.0	68.3
深圳	1,997	1,779	4,890.9	27,592	62.3	3,469.9	88.5
佛山	3,798	962	1,876.3	19,514	41.7	689.1	8.9
東莞	2,460	1,049	1,616.5	15,516	43	1,195.8	10.2
惠州	11,350	607	797.1	13,203	40.3	287.7	12.6
中山	1,781	446	544.2	12,244	46.5	312.6	5.0
江門	9,535	482	568.5	11,837	45.3	199.0	4.3
珠海	1,725	249	598.3	24,068	54.1	285.8	11.7
肇慶	14,891	413	394.7	9,556	40.8	39.0	2.1

以當時市價計算

@ 以當年平均外匯兌換率換算

*2022年數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珠三角各市統計局

產業發展方面，大灣區形成鮮明的「三二一」發展態勢：第三產業佔比最高，其次是第二產業，第一產業佔比極低。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以發展第三產業為主，江門、肇慶和中山第二、三產業並重，其餘佛山、惠州、東莞三市則以第二產業為主。按行業領域劃分，金融服務、創新科技和先進製造業為大灣區三大優勢產業。

根據2024年《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國企業(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數量為133家，其中22家企業位於粵港澳大灣區(以總部地址統計)，當中包括深圳(9家)、廣州(6家)、香港(5家)，東莞(1家)和佛山(1家)。就行業分佈而言，粵港澳大灣區上榜企業涉及了信息技術、汽車、保險、金融、生物醫藥、工業機械、交運物流、房地產、家電等多個領域，尤其是包括了華為、騰訊、聯想、比亞迪、中國電子、立訊精密等6家高新技術企業。

表2：2024年《財富》世界500強粵港澳大灣區企業

企業名稱	所在地	排名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53
中國華潤有限公司	香港	72
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	廣州	78
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	103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	141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143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179
廣州汽車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廣州	181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206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	248
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	277
廣州市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廣州	361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	370
廣州工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廣州	394
廣東省廣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廣州	414
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415
廣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廣州	417
怡和集團	香港	421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深圳	435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	439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446
立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	488

資料來源：財富中文網

創新科技方面，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正在穩步推進。目前，大灣區累計建設10家省實驗室、30家國家重點實驗室、430家省重點實驗室以及31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等實驗室平台；累計建設新型儲能等5家國家級製造業創新中心，納米智造、生物製造等3家國家產業創新中心。截至2023年，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連續四年位居全球創新指數第二，研發投入強度約3.45%。

與世界其餘三大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的比較，粵港澳大灣區有著自身優勢，亦有不少發展空間。粵港澳大灣區佔地面積最大，人口最多，2021年本地生產總值僅次於東京灣區，約為1.96萬億美元。粵港澳大灣區2021年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約為7.7%，僅次於舊金山灣區的經濟增長速度。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均生產總值約為2.3萬美元，與其他灣區比較，仍有不少增長空間。

就產業佈局而言，世界各大灣區均以第三產業為主導，其他三大灣區的第三產業佔GDP的比重達到70%-80%，而粵港澳大灣區則不足70%。與其他灣區的發展策略不同，粵港澳大灣區有著「9+2」的城市群格局，不同城市之間分擔不同產業功能，呈現「現代服務+先進製造」兩翼齊飛的特質。香港佔GDP比重前三的行業為貿易及物流、金融服務業、專業服務業；廣東省佔比前三的行業則為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工業、批發零售業、金融業，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工業佔據主導地位，尤其以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等先進製造業佔比最高。

表3：世界主要灣區基本數據

	粵港澳大灣區	舊金山灣區	紐約灣區	東京灣區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56,098	17,887	17,312	36,898
人口 (萬)	8,662	752*	1,926*	4,435
本地生產總值# (億美元@)	19,581.4*	12,171.9*	19,020.8*	20,940.4^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 (%)	7.7*	10.9*	5.8*	-3.2^
人均生產總值 (美元@)	22,858*	161,946*	96,210*	46,824^
機場客運量 (萬人次)	6,962.5	1,194.0*	7,544.0*	6,418.2
機場貨運及航空郵件量 (萬公噸)	658.0	237.0*	216.0*	315.4
港口貨櫃吞吐量 (萬標箱)	8,205.7	233.7	949.4	838.1
第三產業佔GDP比重 (%)	64.0	70.8*	78.6*	81.4^

以當時市價計算

@ 以當年平均外匯兌換率換算

*2021年數

^2020年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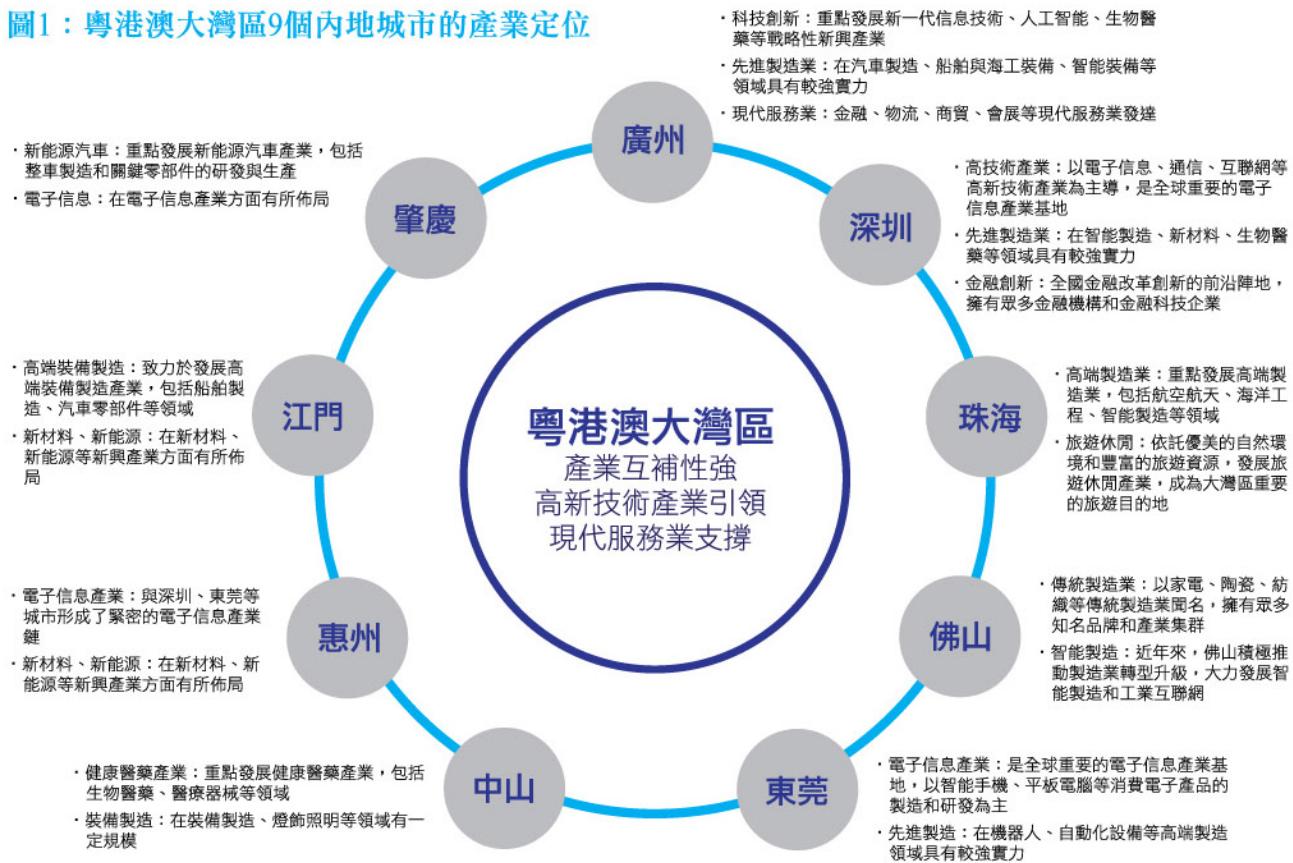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各地區政府統計

2.2 主要城市的產業佈局

隨著大灣區規劃的工作推進，各市逐漸形成優勢互補的功能定位。分區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各地區產業結構具有互補性。香港、澳門以第三產業為主，三產佔比均在90%以上；廣州、深圳呈現典型的「三二一」型產業結構，第三產業佔比突出；東莞、珠海、江門、中山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佔比相差不大；惠州、佛山、肇慶第二產業佔據主導地位。

大灣區可分為四個核心城市、七個節點城市。四個核心城市包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香港的定位為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澳門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廣州為發揮國家中心城市和綜合性門戶城市引領作用，增強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功能；深圳為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七個節點城市為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發揮自身優勢，深化改革創新，增強城市綜合實力，形成特色鮮明、功能互補、具有競爭力的節點城市；同時強化與中心城市的互動合作，帶動周邊特色城鎮發展，提升城市群發展質量。

圖1：粵港澳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的產業定位



2.3 三個國家級粵港合作平台的發展情況

目前已有一個國家級粵港合作重大平臺（前海、南沙、河套），重點探索粵港合作新模式，推動主要合作區域和重點領域的體制機制創新；透過先行先試措施，充分發揮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合作中的試驗示範和引領帶動作用。前海、南沙、河套作為粵港合作重大平臺，雖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舉措，但根據國家發改委的規劃，三個平臺有各自的不同使命，因此在任務安排、政策突破方面有差別化設計，形式戰略互補。三個重大合作平臺在大灣區規劃中的戰略意義在於透過從以點帶面深化合作，並複製推廣成功經驗，因此有需要對前海、南沙、河套的實踐經驗作出階段性總結。

2.3.1 前海

深圳前海是深港合作最早的先行先試區之一，基於其區位特色，以現代服務業領域的發展為主。早於2009年11月，深港兩地政府已共同成立「前海發展聯合專責小組」，就前海地區發展達成基本共識，由深圳市政府負責開發管理，香港特區政府提供發展規劃和政策意見。2010年8月26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明確把前海建設成為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範區。其後於2014年12月12日，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設立，並於2015年4月21日正式掛牌，深圳前海蛇口片區28.2平方公里（含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3.71平方公里）作為三個片區之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表示前海作為重大合作平臺之一，要充分發揮其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合作中的試驗示範作用。

前海作為「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主要是通過香港專業服務領域的機制對接、要素流通，以促進深港現代服務業緊密合作，並提升大灣區專業服務業的國際化水平。因此前海的政策舉措的創新突破主要在工程建設、法律與金融等三個領域。

工程建設方面，前海在「工程監管、工程調解、計量計價、EPC管理、招標投標、規劃設計」6個領域，提出了14項改革措施，於2023年5月正式印發實施《前海建設工程管理制度港澳規則銜接改革方案》。此外，前海對《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香港工程建設領域專業機構執業備案管理辦法》《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香港工程建設領域專業人士執業備案管理辦法》進行修訂，並由深圳市印發《香港註冊安全主任在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執業備案管理暫行辦法》。截至2023年7月，香港已有50家專業機構、444位專業人士在前海備案，有10家香港專業企業獨立承接項目，74名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前海項目建設。

法律方面，前海與香港合作成立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就此，前海出台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前海蛇口自由貿易試驗片區條例、深圳國際仲裁院條例等；成立首個國際仲裁海外庭審中心、首個粵港澳聯營律師事務所、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迴法庭、第一國際商事法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深圳知識產權法庭、深圳金融法庭。此外，前海亦推行「港區調解」、「港區陪審」等制度，並推動「一國兩制三法域」的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

金融方面，前海率先成立全國首家港資控股的消費金融公司、公募基金公司、合資證券公司以及港交所前海聯合交易中心；並打造跨境人民幣貸款、跨境雙向發債、跨境雙向股權投資、跨境雙向資金池、跨境資產轉讓、跨境金融基礎設施等六個跨境金融特色品牌。2023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等5部門共同公佈《關於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意見》（「前海金融30條」）。

截至2022年12月，前海註冊港資金融業企業2,089家。其中，前海港資QFLP（外商投資股權投資）管理企業達82家，佔全市91%，全市24家港資QDIE（合格境內投資者境外投資）管理企業、6家港資WFOE PFM（投資管理外商獨資）企業均落戶前海。截至目前，已有超過200家金融機構入駐，其中港資外資佔比達30%。深圳首單人民幣貿易融資資產轉入業務在前海落地，前海自由貿易賬戶（FT）開立賬戶2,096個，累計交易額折合人民幣4,068.5億元，通過聯通內地與香港兩個市場，前海有效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香港匯立金融集團（WeLab）、眾安科技（國際）、平安壹賬通等一批獲香港金管局虛擬銀行（VB）牌照的機構及其控股集團，陸續在前海佈局金融科技產業。前海微眾銀行、招聯消費金融等已發展成為全國金融科技領軍企業。目前，9家前海企業入選畢馬威2022年中國金融科技雙50強，約佔全市（22家）4成以上。前海金融企業獲得專利授權260件，9家被認定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前海致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試驗平台，以制度創新為核心豐富拓展「前海模式」。多年來，前海新推出制度創新成果70項、累計755項，新增全國複製推廣7項、累計72項。中山大學發布全國自貿區制度創新指數，前海位居第一。最高法院、海關總署、財政部、人社部等出台專項政策，在域外法適用、深港通關便利、所得稅優惠、職業資格互認等領域實現突破。此外，前海成立「科創中國」大灣區聯合體，推動跨界合作，營造創新生態，建構全鏈條技術服務與交易體系，探索加快創新成果轉化應用的組織模式和運行機制，集聚獨角獸企業，目標成為引領改革創新的新高地、新時代制度創新的重要「策源地」。

2021年9月，中央公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將前海合作區由14.92平方公里大幅擴展至120.56平方公里，進一步擴展前海發展空間。前海「擴區」後，具備了空港樞紐、海港樞紐、會展商務、現代服務等國際灣區核心發展要素，擁有良好的生態條件和交通條件，為全面深化前海改革開放提供有力支撐。2023年12月，《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前海規劃」)公佈，為2021年的前海方案作出系統的安排，當中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始終突出深港合作，二是堅持聚焦現代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把前海合作區作為支持香港優勢行業開拓內地市場的重要載體。由此可見，前海經過多年發展，其戰略定位基本圍繞著現代服務業的深港合作，尤以金融及法律領域為主。

案例 思謀科技—深港合作典範，推動灣區產業轉型升級

2023年11月22日，廣東省政府發布了《「數字灣區」建設三年行動方案》，該方案提出2024年粵港澳三地通過數字化合作，推動要素資源流通、數字產業集聚發展、新型基礎設施連通、社會數字化治理等方面形成政府引導、企業主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共建模式，並希冀讓數字化成為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推動力。

思謀科技正是這樣一家誕生於香港、成長於大灣區、服務全球的人工智能獨角獸企業，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大模型等新興技術助力灣區工業產業煥新升級。

目前，思謀科技已通過自研的工業大模型、智能工業平台、智能傳感器產品以及智能一體化設備，服務了來自全球近300家行業頭部企業，以技術促進更高效、更靈活、更先進智造的發展；此外，思謀還不斷拓寬智造外延，基於「智造+」平台與數智化解決方案，自主研發了數字化製造管理系統，覆蓋了從產線到工廠的應用場景，為客戶在全球範圍內提供全面而優質的產品與方案服務。

「創業初期，我們思索如何更好地融入大灣區的數字戰略發展格局中，深圳為我們打開了一條新思路。」該公司選擇在深圳設立工廠：「我們注重為用戶提供解決方案和設備性交互，以適應不斷發展的市場需求，在此過程中，深圳市政府提供的一系列政策補貼和基礎設施支持也為我們的創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得益於深港深度融合高質量發展，思謀科技自成立就步入成長快車道，僅用18個月便躋身獨角獸行列。「我們積極參與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生態建設，幫助香港新型工業化發展，並廣泛開展頂尖高校和全球科創機構的產學研合作，迅速完成科技成果轉化：核心技術開源在香港，應用場景開發在深圳；資本市場融資在香港，智能製造產業化在深圳。」

依託深港雙城，思謀科技作為一家成立僅4年的中國企業，已在全球化發展中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成績。該公司還談到：「我們認為，香港有非常雄厚的科研實力，對於創科產業而言，政策支撐已經非常完備，但如何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切實的產業發展，還需要一些時間。另外科技產業投資回報週期相對較長，需要充分調動商業界積極性，我們看到港投已經開始行動，相信在港投的帶動下，香港將有更多的“耐心資本”出現來合力推動科研成果轉化落地。」

思謀科技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成果備受認可，已成為全球成長速度最快的獨角獸之一。2024年6月12日，香港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港投公司與思謀科技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思謀科技成為港投公司首家合作公司，是真正意義的「香港嚴選」，代表港府產業發展風向標。

在港投公司的支持下，思謀科技將加大研發投入，繼續探索人工智能技術在智能製造及泛製造等領域的應用潛力，推進大模型創新及應用在大灣區更廣泛地落地，引領區域經濟向更深層次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

2.3.2 南沙

廣州南沙空間相對比較廣闊，主要突出「粵港澳全面合作」和「面向世界」，規劃佈局協同港澳的產業項目，並打造服務港澳為主的「港式社區」，以港澳合作擴大廣州對外開放。

南沙是廣東省廣州市最南端的行政區，位於珠江口中心。南沙早於1980年代與香港建立合作關係。當時的南沙仍是廣州邊緣外的一片灘塗，但其區位價值被當時的香港愛國商人霍英東發掘，提出開發建設南沙，成立「霍英東基金會」，並注資興建虎門渡口。其後，霍英東在南沙投資了大量土地；位於南沙資訊科技園的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於2007年成立。由於香港與南沙經年累月的民間合作基礎，南沙於2015年被納入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為廣東自貿區3個片區之一，標誌著作為官方的粵港合作的開始。

南沙是三個片區中面積最大的，意味著其可以承載更全面的功能。南沙自由貿易試驗區共分為七個片區，包括國際航運發展合作區、金融商務發展實驗區、粵港澳融合發展試驗區、國際教育和醫療合作實驗區、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區、境外投資綜合服務區、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服務區。由此可見南沙的定位全面性。

南沙擁有國家新區、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港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等政策優勢。南沙的產業基礎主要是大型裝備製造業，包括造船（國家三大造船基地之一）、汽車和零部件、珠三角核電裝備。此外，南沙亦有一定科研基礎，當中科院廣州工業技術研究院位於南沙的研究基地已初步形成數控裝備技術公共研發和現代物流產業規劃服務等技術創新平台，被評為國家技術轉移示範基地；香港科技大學和霍英東基金會聯合設立的中藥國際化平台亦位於南沙新區。在對外開放方面，南沙有意構建與國際新規則體系相適應的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率先實現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打造國際貿易功能齊全、金融創新能力強的國際航運物流中心，以及形成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科技創新合作的示範基地。

於南沙開展的粵港合作主要圍繞三大主體：一是由香港科技園公司（科技園公司）與香港科技大學（科大）共同實施的科創主題：香港科學園南沙孵化基地；二是位於慶盛區塊，肩負「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中「共建建設美好家園」重要使命的「港式國際小區」；三是在整個合作區內推進現代服務業規則銜接。

為進一步推動示範區建設，南沙創新探索與香港機制對接新模式。2020年4月廣州南沙開發區管委會成立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採取接近香港諮詢委員會運作模式，首批聘任來自內地和香港政商學界的27名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設9個專項工作組（包括商務合作、科技合作、土地規劃、專業服務、青年創業就業等）、秘書處和香港工作站，推動穗港合作更加緊密。

2022年6月14日，國務院發布《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南沙方案》）。南沙方案提出深化粵港澳合作的5個重點發展方向：加快建設科技創新產業合作基地、創建青年創業就業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打造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高地和建立高質量城市發展標杆，將南沙建造成為香港和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載體和有力支撐。2022年，《財政部稅務總局關於廣州南沙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作為《南沙方案》後首個落地的重大政策，明確了具體標準、適用範圍。在保障稅收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營造與港澳趨同的稅務環境，吸引更多國際人才到南沙就業創業，為南沙攜手港澳拓展雙向開放奠定良好基礎。

此外，南沙出台建築和交通工程專業港澳人才職稱評價管理辦法，設立粵港澳大灣區職稱和職業資格業務一站式服務平台，鼓勵港澳專業技術人才直接參與內地人才評價，構建全面開放的大灣區職稱評價體系。南沙把促進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為重要目標，不斷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工作生活的政策措施體系，南沙區發展和改革局搭建了南沙惠港惠澳政策一站式服務平台，集中發布港澳人士可享受的優惠政策40餘項。

案例 小馬智行—智馭未來，粵港澳大灣區自動駕駛先行者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2023年9月發布的《2023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3)顯示，小馬智行憑藉其卓越的創新實力，再次穩固了其在全球創新版圖上的領先地位，連續四年蟬聯全球第二的殊榮。總部位於廣州南沙的小馬智行正是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能力不斷發展的最好證明之一。

小馬智行敏銳地捕捉到了南沙在自動駕駛領域的發展機遇。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先行先試」重點地區，南沙是全國首個對自動駕駛開放全域測試的地區。而小馬智行更看到了物流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市場潛力的廣闊，「南沙+自動駕駛+卡車」成為了小馬智行在2018年起發展的一個戰略賽道。如今，小馬智行旗下的小馬智卡已經擁有全國最大的自動駕駛卡車車隊，每日超過200輛自動卡車穿梭在繁忙的跨省公路上。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小馬智卡憑藉一段長達6小時的連續無接管自動駕駛視頻，成功創下了最長自動駕駛視頻的世界紀錄，彰顯了其在自動駕駛技術領域的卓越實力^[1]。

可以預見到，在未來一到兩年的時間裡，大城市的全域或部分區域將逐步開放自動駕駛服務，特別是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它們將發揮至關重要的引領作用，推動自動駕駛技術的未來發展。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即使是像北京亦莊、上海嘉定、廣州南沙和深圳臨港等一線城市較為偏遠的區域，人口數量也在持續增長，交通狀況日益複雜，這無疑為自動駕駛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應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挑戰。此外，突破「封閉」的測試區域環境，實現城市間自動駕駛許可的互認互通，將是自動駕駛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助力自動駕駛技術在更廣泛的範圍內落地和應用。

自動駕駛技術的長足進步與廣泛應用，其背後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便是法規政策的健全與落實。這包括但不限於地方立法的持續推進、自動駕駛車輛責任歸屬的明確界定、保險賠付方案的合理制定，以及技術與法律框架的深度融合。特別地，面對數字化時代所帶來的潛在挑戰，如黑客攻擊的風險、數據安全的保障以及國家安全的維護等，這些都是未來國家在制定和推動自動駕駛立法時必須著重考慮的核心要素。

「除了外部支持以外，自動駕駛技術的深入發展更需要行業內部積極推動產業規模化。當前，許多潛在的國內外客戶對我國自動駕駛應用總體上仍持觀望態度。」小馬智行介紹道：「像是對於一些出行、物流等行業客戶而言，自動駕駛帶給他們最直接有效的燃油、人力、保險等成本收益。然而，要實現這些效益，我國自動駕駛行業必須構建出基於大規模落地應用且具備盈利能力的商業模式，並達到公眾期待的技術性能和安全可靠性標準。只有這樣，自動駕駛技術才能真正推動整個產業的迭代升級，贏得市場的廣泛認可。」

2023年10月，小馬智行獲得深圳市級首個無人化示範應用許可，並獲准在深圳核心城區向公眾提供無人化自動駕駛出行服務。小馬智行表示，「我們的自動駕駛商業化之路正不斷邁坎提速，未來我們將持續加碼研發，以技術為底座不斷提升產品功能與體驗，引領自動駕駛『跑』得更快更遠。」

2.3.3河套

河套位於深圳與香港交界，是因深圳河治理工程而形成的新區域，深港雙方其後決定以「共同開發、共享成果」原則，合作推動河套地區發展。2017年1月3日，深港雙方政府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明確提出河套以「創新及科技」為主要發展方向。

河套的戰略定位是「小而精」，深港兩個園區一共才3.89平方公里，但以深港創科協同為目標。2023年8月29日國務院印發了《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河套方案」），提出河套的中心任務是要協同香港推進國際科技創新。圍繞此中心任務，河套的發展著重推動深港協同創新，特別是發揮香

[1] 南沙向“新”行！搶佔人工智能“萬億賽道”，新質生產力在這看得見、摸得著！廣州日報新花城
<https://huacheng.gz-cmc.com/pages/2024/05/18/9470b9a3238442ffab3f0fba2070dcfa.html>

港在基礎研究、國際化人才、與國際接軌的先進科研體制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以推動深港兩地在科技創新方面的深度合作和優勢互補。因此，河套的發展定位有三，包括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先導區、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中試轉化集聚區。

河套另一大特色為三個重大合作平台中，唯一一個與香港接壤的區域。因此，河套的深圳與香港園區之間，亦致力在「一區兩園」中作出跨境要素流動的制度突破。措施包括明確對實施特定封閉管理的海關監管區域人員進出、貨物流動實行「一線」「二線」分線管理，促進創新要素高效便捷流動，創造高度銜接香港及國際的科研制度環境；支持深圳園區和香港園區協同發展，支持深圳園區加強與香港園區建設時序、重點領域、重大項目的銜接，推動設施互聯、服務共享、創新協作，積極配合香港科技創新發展戰略，有力支撐香港北部都會區規劃建設。

河套在有限發展空間中的創新突破，意味著其必須與其他區域聯動協同。如在創科產業鏈上，主力「研發」及「中試」，其他部分則需要連接香港北部都會區及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因此，河套的規劃目標亦以協同聯通為重點，2025年基本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創新協同機制，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取得積極成效；深圳園區監管模式運作成熟，與香港園區基本實現要素流動暢通、創新鏈條融通、人員交流順通；建立與香港及國際全面對接的科研管理制度，集聚一批香港及國際優勢學科重點實驗室集群和卓越研究中心、頂尖企業研發中心，與香港科技合作取得一批重大成果；2035年與香港園區協同創新的格局全面形成，科技創新國際化程度居於全球領先地位，創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動，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創新載體和頂尖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成為世界級的科研樞紐，有力支撐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的建設。

案例 阿斯利康一大灣區創新脈絡編織本土化發展新篇章

阿斯利康投資（中國）有限公司（下稱：阿斯利康）於1993年進入中國，從銷售營銷開始，在2022年開始考慮在研發和生態系統建設方面的拓展，包括細胞治療等先進療法和利用香港的金融服務支持整個生態系統。如今，阿斯利康立足中國本土化發展，不斷在藥物研發、生產運營、商業模式等領域創新發展。

「我們在2023年第六屆進博會上達成了60餘場、交易額超4億美元的在華投資和戰略合作簽約，像是舉行2023年廣州開發區、黃埔區阿斯利康廣州公司藥品引進簽約儀式，同時宣佈兩款腫瘤及罕見病藥物在大灣區的快速准入。」阿斯利康介紹道：「我們借助『港澳藥械通』先行先試政策，希望通過這兩款藥物為更多有需要的患者帶來希望。」

「除此以外，我們還計劃讓廣州生物島上的國際生命科學創新園能夠借助粵港澳大灣區這樣的『東風』，通過啟動園區配套基金，並且聯動基地基金，從而推動更多國內外優質『專精特新』企業在廣州落戶。」

作為從上海、無錫等長三角地區發跡的企業之一，阿斯利康近年來也開始嘗試將業務版圖拓展至香港、廣州等地，阿斯利康提到佈局香港的重要考量：「香港在學術發展、人才吸收、監管體系、國際接軌等大灣區發展格局中具有很獨特的優勢。倘若未來香港能夠利用好跨境交流的優勢，將自身打造成為一個連通國內外『走出去』和『請進來』的平台，這將會讓香港成為在大灣區乃至整個中國的醫藥發展戰略中最獨一無二的地區。」

「以藥品審批制度為例，在政策上如若通過香港讓西方的FDA審批制度與內地的審批制度做到相互認證並達成合作，並從此建立起互認標準，那麼將會極大地提高香港地區在整個醫藥行業發展的影響力。」

阿斯利康同時也指出了香港未來發展應當注意的一些方向：「發展要著重揚長避短，香港的土地有限、勞動力昂貴，因此適合發展對空間和技術要求較高的產業，做高端研發，而製造則可以考慮放在內地。除了探索建立創新平台等合作模式以外，香港需要進一步完善監管升級、審批簡化等方向，明確自身在產業鏈中的定位，與內地分工合作，協同其他地區推進醫藥產業發展，積極打通中間環節。」

「中國已然成為阿斯利康全球第二大市場和重要的增長引擎，我們很樂意繼續不斷深化與像粵港澳大灣區這樣的中國熱門發展地的合作，繼續加快阿斯利康在國內業務的科研創新發展速度。」阿斯利康還透露，阿斯利康將規劃設立「阿斯利康全球研發中國香港分中心」，借力粵港澳大灣區窗口效應，全方位鏈接全球研發創新網絡，推動中國創新藥走向世界。

三、香港把握大灣區未來發展機遇的策略

大灣區作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戰略平台，應以更宏觀及長遠的戰略眼光思考如何積極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同時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家級的戰略規劃及發展工作。

香港應積極探討在大灣區開發戰略拓展區，促進香港在「由治及興」階段及其後長遠發展的重大部署。對香港而言，戰略拓展區的價值須符合三個基本元素，一是有利於香港自身的經濟及社會長遠的發展需要，從而促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二是有利於香港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推動香港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制度條件打破西方戰略封鎖；三是進一步推動粵港合作機制突破創新，探索更高效及更有力的協作治理模式，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3.1 與「北部都會區」規劃的戰略聯動

根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是以《香港2030+》規劃為基礎，同時因應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給予香港的支持，將原來《香港 2030+》中的北部經濟帶擴展及整合為總面積達 30,000 公頃的區域發展為一個最終能容納約250萬居住人口和提供約65萬個工作職位的新都會區。此區的規劃重點在於提供用作創新科技發展用途的土地，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並配合「十四五規劃」的支持，建設國際化創新科技中心。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意義不止在於香港經濟及產業結構層面，更在於突破香港規劃的空間概念，透過地緣優勢加強與深圳的協同，促進深港合作。隨著香港與深圳之間的七個陸路口岸和相連的交通基建的建設，將形成港深由「雙城三圈」到「雙城四圈」的空間格局。因此，進一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重大戰略部署和必然選擇。

根據目前的規劃進度，北部都會區將在未來 5至 10年漸見雛形，並在 20年內大致完成發展。加強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協同，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一步；但目前仍是早期的一步，整個大灣區發展格局尚未成熟，香港必須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及早謀劃。

「北部都會區」雖然拉動了香港靠近內地的關係，發揮深港協同效應，但就大灣區的整體區域佈局而言，香港的區位仍是偏於一隅。香港要更進一步把握大灣區發展的機遇，對接大灣區發展戰略，關鍵在於更有效地善用大灣區的各類要素。就此，若要更好地匯聚大灣區的資源要素，香港需要一個更靠近大灣區中心的「戰略性發展功能區」，作為在大灣區的重要布點，強化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的角色，發揮積極作用。

3.2為「新型工業化」增量賦能

以創新科技為核心，先進製造為主體的「新型工業化」，已成為香港未來產業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對於彌補香港的產業結構單一、強化國際競爭力具有關鍵作用。為了有效推動新型工業化，特區政府於2022年底公佈《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當中提出一系列「發展願景參考指標」，尤以要將「製造業佔以基本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由2022年的1%(2020年數字)到2032年時提升至5%(2030年數字)備受矚目。

現屆特區政府強調「以結果為目標」，採取積極進取的施政風格，有力推動香港「由治及興」。然而，發展製造業的指標對目前的香港而言，具有一定挑戰性。若以本地生產總值(GDP)預計增長3% 推算，要在2032年時製造業佔GDP 達5%，香港製造業的增加值要達到1,732.657億港元，與目前(2022年)的266.08億相差1,466.49億。以先進製造業增加值約為產值的30%推算，到2032年，香港製造業要增加4,888.30億產值。

香港土地資源較少，發展空間受限，對於土地需求較大的製造業並不有利。相對於服務業，製造業需要較大的土地空間，但由於發展空間不足，加上高端服務業的發展拉高土地價值，香港製造業面對覓地困難和租金成本高等問題。在回歸初期，香港曾匯聚過大批國際科技企業在本地設立屬亞太區的研發中心，更曾擁有亞洲最先進芯片製造產業鏈，部分大型企業更有意在港擴建芯片製造工廠，但因香港土地資源制約的問題無法如願而遷出其生產線。如今香港製造業在設立或擴展智能生產線、進行大規模工業生產、甚至開設辦公室等方面面對嚴重的土地資源制約問題。

由此可見，香港難以在本地獨立發展先進製造業，即上至科研下至大規模製造的完整產業鏈。在發展先進製造業的過程中，「創新」與「製造」是產業鏈的不同環節，二者缺一不可，但目前香港的這兩個環節尚未建立充分聯結。香港若要成功發展先進製造業，並達到將製造業佔GDP比重由目前1%提升至5%的指標，需要加強與內地地區合作，運用內地已有的產業基礎、生產要素、融資市場。香港的新型工業化策略須將科技研發和工業製造分成兩個產業鏈的不同端，讓大規模的生產環節落地在大灣區其他城市，實現產業整合發展，共同推動大灣區先進製造業協同發展的工業生態。

3.3於「黃金內灣」合作開發新型深度合作區

香港以創新科技為核心的發展戰略需要突破原有的空間佈局思維及產業分工模式，就此要與內地城市加強深度合作以創造機會。然而，現存的三個主要粵港合作平台（前海、南沙、河套）均沒有以針對香港新型工業化策略需要為目標的合作政策，存在合作領域空白。此外，三個平台的協作治理經驗均有可以完善之處，如前海雖以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為重點，但在實際運作上，仍以深圳為主導，香港方的參與程度不高，亦欠缺積極性；南沙雖突破性地設立「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開創粵港合作的G2B模式，但諮詢委員會仍不是官方決策機構，政策突破的推動力度有限。河套作為最新的合作平台，採用「一區兩園」模式，但實際上仍是分別管理，未有形成高效的兩地協作，使兩園的發展進度難以協調。因此，若能設立一個新的粵港深度合作區，在協作治理制度以及具體合作模式上先行先試，給予香港更大的參與權，有助於開拓一國兩制下，兩制合作的重大實踐突破。

就此，香港可基於發展戰略考慮，與大灣區的黃金內灣區域開展合作，選址包括東莞濱海灣新區、中山翠享新村，打造繼前海、南沙、河套後的新時期粵港合作重大平臺。合作平臺除發揮自身的區位與產業優勢外，也要體驗香港在協作治理上的積極參與，發揮規劃戰略優勢，把握與其他平臺的聯動協作潛力。

在協同發展方面，新平臺要重視兩組關係。一是與深圳的前海、河套的關係，在新區發展「先進製造」的同時，與前海的「現代服務業」、河套的「科研創新」形成產業鏈分工。二是與廣州南沙的關係，基於南沙的全方位發展，也在發展製造業，新區應與其進行產業互補，如南沙的大型裝備、汽車製造業與新區的其他領域的先進製造業可以錯位發展。此外，新區與南沙的港式社區也可以建立聯動關係，形成更大範圍的港式生活圈。

新區應運用其黃金內灣的區位優勢以及先進製造的產業基礎，形成具有「生產+外銷+內銷」功能的「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功能區」，實踐「香港研發、新區製造、全國市場」。同時，新區積極與前海、河套、南沙聯動，促進平台協同發展，成為粵港合作重大平臺的「關鍵拼圖」。此外，合作區將在協作模式、政策措施層面推動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突破，承載香港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戰略價值。

3.4創設香港特區政府投資公司與內地共投共管模式

「粵港新型深度合作區」要建成國際水平的合作區，發揮制度創新、深度協作的戰略定位，需要與香港建立合作投資、開發、管理的模式。就此，可以參考中國和新加坡合作的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由香港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內地政府企業合作投資和共同管理。

建議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合作，由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帶頭參與「粵港新型深度合作區」投資開發及建設營運，並享有新區後續發展收益。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2022年10月成立，由香港特區政府全資持有，董事會主席為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2023年10月3日香港投資公司宣佈，任命原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總裁陳家齊為首任行政總裁，任期3年。香港投資公司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以政府為主導參與市場投資，被稱為港版「淡馬錫」，旨在透過物色投資機遇，策略性推動目標產業發展，長遠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和經濟活力，並賺取投資回報。目前，香港投資公司共管理初始規模620億港元的基金。

香港投資公司正研究運用其管理的「大灣區投資基金」，與廣東省政府和其他機構合作，共同設立基金，投資於大灣區具有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項目，長遠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和經濟活力，並賺取投資回報。就此，香港投資公司可積極考慮運用「大灣區投資基金」投資合作區。

就此，建議由代表內地市政府的投資公司與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雙方聯合設立「合資管理公司」；一方面，董事局董事由管委會委任，以確保管理公司按照管委會的規劃落實工作；另一方面，合資公司可透過企業化的管理，使在具體工作推動及落實上更有積極性及靈活性。管理公司主要負責土地開發、開展國際推介、招商引資、產業導入、項目建設等事項；參與包括但不限於批租土地或樓房作科研或生產設施、建設粵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國際人才社區及其他配套設施。合資公司應借鑒國內及國際上產業園區開發運營的專業經驗，依託合作區在技術、人才、投資、服務體系等方面能夠實現粵港交互合作的優勢，打造先進製造業領域國際化產業鏈平臺、先進研發中心及高端產業集群。

案例 蘇州工業園區—跨境協作治理的模範

蘇州工業園區是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間的首個合作項目，於1994年2月經國務院下達《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有關問題的批復》設立。園區目前形成了「3+2+1」的現代產業體系，「3」為生物醫藥、納米技術和人工智能三大新興產業；「2」即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兩大主導產業，「1」即現代服務業。園區內覆蓋了通信技術、交通、醫療和金融等領域，擁有豐富的園區產業生態和輻射效應，截至2023年4月，園區共有世界500強企業投資項目166個，省市區三級總部企業168家，中外名校33家，國家高技術企業2,489家，上市企業61家，各級獨角獸及準獨角獸企業180家。

蘇州工業園區的行政管理由中方全權負責；成片開發由中新合資的開發公司（CSSD）負責；而對外招商引資則由中新聯合共同負責。在園區建設開發過程中，工業園區可獨立自主地、有選擇地借鑒新加坡經濟發展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經驗。園區的領導架構為「中新聯合協調理事會」，由中、新兩國的官方代表出任理事，理事會中方委員會的主要任務為聽取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進展情況的匯報、協調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和借鑒運用新加坡管理經驗中的重大問題。

蘇州工業園區積極借鑒新加坡等先進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堅持新型工業化、經濟國際化、城市現代化互動並進發展路徑，建立了與國際接軌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園區摒棄單一發展工業的模式，著眼於「產城融合、以人為本」的定位，按照「先規劃、後建設」，「先地下、後地上」的原則，保持城市規劃建設的高水平和高標準。

李光耀曾講述選擇落戶蘇州的原因，一是靠著上海和長三角地區，蘇州可獲得各種現代化大城市的輻射，二是從歷史的角度看，蘇州有人文的優勢，而李光耀認為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蘇州工業園區可說是集合天時、地利、人和的跨境協作範例。蘇州地處長三角中心地帶，具有極其優越的交通地理條件；緊鄰上海，擁有國際空港、國際海港、國際金融信息港的便捷優勢；地處太湖流域，具有2,500多年的歷史文化名城，經濟文化的歷史積累豐厚；勞動力和人力資源豐富，生產要素價格相對低廉。此外，蘇州工業園區從產業、創新、人才等三個方面，為入駐企業提供產業政策扶持、科技創新平台、金融扶持、人才激勵等全方位鼓勵措施，持續推動創新發展。在實現中新合作開發體制後，政策的優勢仍然可以擴大，開發的資本進入加快，形成優質的投資及生產環境。

然而，工業園區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兩國因為在文化、管理經驗和法律制度上的差異，關係曾出現矛盾，加上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使得招商引資的工作變得困難。當時蘇州工業園區正好完成部分基礎設施建設，正準備對外招商引資，但因為外圍環境，中國的國際資本卻開始往外流，導致園區的部分項目與周邊一些開發區形成了競爭關係。對此，李光耀強調：不應只著重招商引資的金額，還應該注重團隊的成長。對於創新的協作機制，人才團隊至關重要，這經驗使擔任蘇州工業園工委書記的陳德銘印象深刻。陳德銘後來除了擔任蘇州市長，也兼任中新合作蘇州工業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2年1月，時任蘇州市委書記的陳德銘率團訪問新加坡，再次與李光耀見面，李光耀當時對他說了一段話：「中國這麼一個大國，有13億人口，特別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很快，完全跟得上新加坡」、「新加坡可以做得到，你們也完全可以做得到。」

3.5 設立先進製造業「CEPA拓展園區」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是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訂的一項自由貿易協議。這項安排令一系列符合CEPA原產地規則的香港產品，根據有關CEPA原產地證書輸入內地時，可享有零關稅優惠。按照現行政策，可以根據「一般原則」，以「區域價值成分」定義「原產地」，只要貨物的「區域價值成分」大於或等於30%，即可以香港為原產地，享受零關稅優惠。「區域價值成分」的計算方法如下：

$$\text{區域價值成分} = \frac{\text{原材料價值} + \text{勞工價值} + \text{產品開發支出價值}}{\text{出口貨物離岸價值}} \times 100\%$$

然而，基於由於香港本地的產業結構以及生產條件，貨物主要生產程序並不在香港，難以享受這個優惠。根據調研所得，一些廠家為了取得CEPA零關稅優惠，透過對原材料進行特別包裝處理工序，使其「區域價值成分」能符合政策要求。事實上，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的數據，自2004年CEPA開始實施至2023年5月底，共批出超過237,000份CEPA原產地證書（可享用零關稅），涉及貨物的總值約1,451億港元。然而，同時期間（2004年至2023年5月底），香港整體出口到內地的貨值為353,212億港元。這段時間享用CEPA零關稅（香港出口到內地）的貨值，只佔香港整體出口到內地的貨值的0.4%。這反映了CEPA零關稅的優惠政策仍有進一步發揮的潛力。

CEPA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舉措，但由於香港的產業發展情況，使CEPA中的貨物貿易優惠一直未能發揮成效。近年，隨著國家的貿易政策進一步開放，如設立海南自由貿易港、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的貨物進出口稅收政策，其開放程度不下於CEPA，不利於香港鞏固國際貿易中心以及推動新型工業化。

因此，建議於現有的合作區內設立「CEPA拓展園區」，把CEPA中「香港」原產地的定義延伸到合作區裡的特定空間。就此，設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並爭取以電子圍網方式管理。一方面，原材料可以免稅進入該區，另一方面，在區內進行的生產，都算作「香港」的區域價值，使得產品可以享受CEPA下的零關稅。設立「CEPA拓展園區」可激活零關稅政策，使「香港製造」更有利進入內地市場，不只有政策需要，也有戰略意義。

「CEPA拓展園區」除了生產製造功能，也可以爭取試行有利數字貿易的政策，助力區內生產的貨物開拓內外市場。例如，設立專為香港產品而設的「香港倉」，減輕時間及物流成本。對於透過跨境電商的方式開拓內銷市場的香港業界而言，在商品銷量有限且不穩定的情況下，自建倉庫的成本較高。就此，建議在現有的保稅倉庫開設「香港倉」存儲香港貨品，從而降低中小企業進入內銷市場的成本。此外，為支援港資企業升級轉型，建議推出「跨境電商助推計劃」，資助港資企業在發展策略、人力資源、設備升級、內部管理等方面進行提升，使營運模式更加貼合跨境電商的發展需要，從而鼓勵企業善用現有跨境電商平台，將現有銷售渠道接入電商平台，為企業增加新的增值板塊，探索新的營運模式，開拓新客源。

案例 前海數貿——引領數字貿易革新

深圳前海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憑藉完備的生態以及豐富的經驗，前海跨境電商業務規模長期佔深圳全市90%以上。2024年一季度，深圳前海跨境電商進出口額超過1,100億元，增幅超過95%，規模創同期新高。

深圳前海數字貿易科技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前海數貿）指出，行業洗牌深刻改變了貿易型大賣壟斷市場的格局，為產業帶企業帶來了轉型升級、進軍跨境賽道的寶貴機遇。然而，在這一進程中機遇與挑戰並存，跨境電商和製造業面臨著如何有效打破各種壁壘的緊迫難題。如何克服這些障礙，實現更為順暢的發展，成為了雙方共同關注的焦點和亟待解決的任務。

「我國目前的工廠型企業實現轉型、進入到跨境電商賽道的比例不到4成。在眾多企業中，大部分由於面臨各種挑戰和困擾，對於跨境運作持謹慎態度，甚至缺乏勇氣和信心去嘗試。儘管這些國內跨境電商企業在產品實力上已經展現出較強的競爭力，但它們對金融服務支持等需求卻十分迫切。然而，融資難、資金短缺以及稅收政策落地等問題，依然成為阻礙這些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難題。這些問題不僅限制了企業的跨境運營能力，也影響了其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因此，解決這些難題，為跨境電商企業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務支持和政策環境，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由於語言、文化等差異，以及內地政策的解讀成本等問題，香港等地的新興企業在進軍內地市場時面臨諸多挑戰，難以輕鬆分得一杯羹。」該公司談道，「除此以外，對內地市場的關注度和認知程度也是這些企業打通內地發展的一道門檻。近年來，內地的發展速度對更多意圖涉足跨境電商進口的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精準定位目標客戶群體成為這些企業的工作重點和難點。」

該公司介紹，自2019年由前海管理局成功推動跨境電商事業部實現公司化轉型後，前海數貿積極致力於國際貿易的數智化革新。一方面，著力推動前海自貿區內前海綜合保稅區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引領其邁向新的高度；另一方面，聚精於將前海的創新模式複製並推廣輸出到全國，聚焦協助各地進行「跨境電商+產業帶升級」的戰略目標，進一步推動我國外貿企業及工廠成功發展跨境電商業務，提升利潤空間，並構建一套融合「線上平台+線下園區」的跨境電商全鏈路生態體系。

「作為一家依託前海跨境電商創新模式成立起來的數字貿易公司，前海數貿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各項政策的支持以及一流營商環境的滋養，尤其是在全國各地落地建設跨境電商產業園的過程中，這些優勢因素更是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與堅實的基礎。」

該公司表示，「經過我們的積極努力和大力推動下，國際貿易『前海模式』已在全國得到廣泛地複製與推廣，在海關設立了9個海外服務中心。目前，前海數貿已與14個省份，40個城市的多個相關政府部門進行了深入的洽談，涉及各地區跨境電商產業發展規劃、綜合保稅數字化建設、綜合保稅區及跨境電商綜試區產業服務、數字貿易產業園運營、產業帶跨境電商出海等領域的合作。通過這些合作，成功地協助了多地政府部門實現數字化產業管理、推動監管單位實現數字化貿易監管，引導傳統國際貿易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促進我國優勢產業跨境電商出海。」

展望未來，前海數貿將繼續鞏固並拓展其在數字貿易、跨境電商以及資源整合領域的影響力，幫助更多企業搭建緊密合作的橋樑，聯結大灣區及內地深化合作。攜手社會各界，共同推進國際化進程，為更多企業品牌提供卓越服務與體驗，助力實現全球市場的拓展與佈局。

3.6 合作打造高端旅遊休閒項目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願景是要對標世界一流灣區，成為國際高端人才的集聚地，就此需要發展高端旅遊休閒項目，使大灣區成為充滿活力的國際一流城市群。依托大灣區的獨特地理條件，擁有中國最長的海岸線和豐富的內河航線，海島眾多，風光優美，且大灣區城市經濟發達，加之香港擁有豐富的遊艇項目管理經驗，因此可進一步推動香港與內地城市合作打造優質遊艇航行旅遊項目。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構築休閒灣區，推動粵港澳遊艇自由行有效實施，加快完善軟硬件設施，共同開發高端旅遊項目。」作為大灣區建設的一個重點項目，推進粵港澳遊艇自由行的落實有利於提升遊艇產業競爭力，對於發展灣區海洋經濟，豐富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產品供給，提升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的競爭力具有積極意義。此外，隨著粵港澳遊艇自由行的實施，將有助帶動三地在遊艇製造、海上旅遊、專業人才交流等領域的發展，促進服務業、餐飲業、住宿等行業的增長。

對香港而言，香港目前登記註冊的遊艇數量約18,000艘，而全港10家遊艇會的泊位總數量僅約2,000左右。現有遊艇會正規的泊位只能滿足市場約11%的停泊需求，供不應求問題嚴重。就此，開放粵港澳遊艇自由行能夠有效紓解香港遊艇的停泊難題。此外，香港地區雖然遊艇數量多，但遊艇會及配套資源非常短缺，嚴重供不應求。遊艇定期的上排維修保養也成了船東面對的極大難題。透過粵港澳遊艇自由行的實施，允許港澳籍遊艇進入廣東地區，停靠大灣區的遊艇會，得到配套齊全的岸上維修服務，以及遊艇製造業提供相關產業鏈服務。此外，遊艇船東（企業）的商務活動亦可借助平台開展，依託廣州及珠三角經濟腹地，維繫、拓展港澳及內地的商貿業務往來，與此同時，促進合作共贏。因此，特區政府應與內地政府進一步推動遊艇自由行的落實，實現「進得來、遊得動、出得去」。

首先，遊艇開放口岸標準尚待明確。「進得來」的前提是設立遊艇對外開放口岸。先要有開放口岸這一平台，遊艇才能順利通關入境。遊艇不同於客輪、商船，其性質及用途是集航海、運動、休閒娛樂等功能於一體，且客流量遠遠低於客輪，故傳統的一類、二類開放口岸對於遊艇這一特定的事物未能相互匹配，相關要求帶來的資金和成本壓力，遊艇碼頭無力負擔。就此，建議參考海南《瓊港澳遊艇自由行實施方案》中「政策措施」第（一）項第1條，出台適用於遊艇的開放口岸建設及驗收標準，在遊艇會範圍內辦理遊艇出入境清關查驗手續。制定遊艇安全有效監管的軟、硬件配備標準，既適用於企業運營，又滿足查驗單位對遊艇及人員的監管，力求突破目前的瓶頸，為遊艇自由行落地實施提供先決條件。

第二，優化遊艇入境擔保政策。遊艇屬性在海關的定義，既是交通工具，也是貨物，作為暫時進出境貨物管理，進境時需繳納相當於稅款的保證金或其他形式的擔保。遊艇普遍作為休閒娛樂的一種生活方式，對於船東以及遊艇企業而言，擔保所涉的手續及成本會影響港澳遊艇參與自由行的積極性。就此，建議參考海南《瓊港澳遊艇自由行實施方案》中「政策措施」第（二）項第1條，建議對通過自由行方式辦理入境手續的港澳遊艇實行關稅免擔保入境政策，口岸管理部門進一步加強和提高對境外遊艇的監管能力和水平；並且簡化程序手續，降低行政成本。

第三，便利通關管理手續。「粵港澳遊艇自由行」涉及查驗單位較多，須協調工作內容量大且複雜。就此，建議以南沙作為連接港澳的重要樞紐平台，在南沙先行先試，探索遊艇自由行通關便利化，研究制定符合廣州實際的便利化通關舉措，支持遊艇自由行長遠、規範、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建議採取創新通關模式，充分利用就近口岸的查驗資源力量，在指定的遊艇停泊碼頭現場開展清關查驗手續，一方面可提高通關效率，另一方面亦可保障遊艇及人員上下艇的安全管理。對於入境通關後的遊艇管理，建議港澳籍遊艇辦結入境清關手續後至出境前，按照內貿船舶落實對應的水上交通及公共安全管理；在出境時則在入境口岸辦理出境手續。

案例 南沙遊艇會——推動落實灣區遊艇自由行

廣州南沙遊艇會管理有限公司(簡稱「南沙遊艇會」)，於2011年7月正式落成，是廣州南沙區政府與霍英東集團攜手開發的高端遊艇會項目。南沙遊艇會位於廣州市南沙灣，總佔地面積達170,000平方米（其中港池面積為130,000平方米），坐擁總建築面積達9,000平方米豪華會所和720米長防波堤，352個水上泊位，120個乾倉泊位，可停泊165英尺長超級豪華遊艇，為目前中國南方規模最大、遊艇泊位最多、配套服務能力最強的中港合資的國際化遊艇會。於成立之初，南沙遊艇會已收到英國遊艇碼頭協會（簡稱TYHA)頒發的「五金錨獎」，成為中國內地首家獲得「五金錨」獎的遊艇俱樂部，這也是碼頭認證的國際最高標準，並在2015、2018年複審中再次通過MIA五金錨認證，延續「五金錨」榮譽。

南沙遊艇會不只是一家企業，更在推動大灣區遊艇自由行方面，與業界政府協作無間。2012年，廣東省旅遊局牽頭聯合相關主管單位研究粵港澳遊艇自由行事宜，「粵港澳遊艇自由行概念」正式推出。同年10月，首屆南沙灣國際遊艇博覽會暨首屆中國遊艇文化論壇在南沙遊艇會成功舉辦，標誌著遊艇會著力推動大灣區遊艇發展的新篇章。廣州南沙是粵港澳合作重大平臺之一，也是連接珠江口兩岸城市群和港澳地區的重要樞紐節點，南沙遊艇會地處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南沙灣片區，是粵港澳遊艇自由行方案指定的廣州停泊碼頭，結合多年來境外遊艇出入境的成功操作經驗，助推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常態化實施。

2015年，南沙獲批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後，推進粵港澳遊艇自由行被列入廣東自貿區建設的一項重點工作任務，自2017年5月起，廣東省政府及有關部門積極落實推進粵港澳遊艇「自由行」政策，並積極探索在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推進粵港澳遊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實施。2017年6月由國家交通運輸部、公安部、海關總署、質檢總局四部委聯合發函，原則同意了《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實施方案》。為更好推進《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實施方案》落地，並為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常態化做充分準備，經各級政府討論建議率先在南沙自由貿易試驗區開展粵港澳遊艇「自由行」試點推進工作，並制定了「定點停靠、就近聯檢」的管理模式，南沙客運港為就近聯檢地點，南沙遊艇會碼頭為定點停靠監管地點。

2017年7月24日，由廣東省旅遊局牽頭的粵港澳遊艇「自由行」首航儀式在南沙遊艇會舉行。其後，另有6艘外籍帆船賽艇於沃爾沃環球帆船賽廣州停靠站活動期間（2018年2月1日至5日），以特事特辦為前提，採用粵港澳遊艇自由行通關方式從香港至南沙。然而，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尚未落地常態化實施。

有關部門曾反映：「定點停靠，就近聯檢」模式中的聯檢碼頭，而南沙客運港是客運碼頭未能符合遊艇靠泊。運營方研究制定了自由行配套碼頭建設方案，並遞交港務部門審批，港務部門反饋意見為：「建設方案與《廣州港總體規劃》、《廣州港南沙港區規劃調整方案》不符，也不符合港口岸線深水深用的原則，且該段岸線為預留南沙國際郵輪碼頭二期工程深水岸線，建議粵港澳遊艇自由行配套碼頭工程選址於南沙遊艇會或其他更合適的地點。」就此，南沙遊艇會根據上述意見制定了在遊艇會以水上平台躉船作為查驗碼頭的方案。隨後，2018年底，南沙區召開遊艇自由行專題會議，會上提出新的思路及指導意見：南沙遊艇會通過建設水上泊位、空中廊橋等方式連接郵輪母港航站樓，共用郵輪母港航站樓查驗設施辦理外籍遊艇出入境清關手續，以此推動南沙遊艇會口岸開放。2019年5月，廣東省及廣州市口岸辦領導到南沙調研遊艇自由行工作進展，建議將工作方向調整為：由遊艇會建設相關查驗配套設施，直接申請對外開放口岸，以達到高效便捷的通關，提供優質的客戶體驗感的目標。

企業篇



四、大灣區企業發展觀察

4.1 大灣區企業發展現狀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近年來在企業增量、價值創造和產業分佈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從企業增量來看，自2019年《綱要》發布以來，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增長了約3.8萬億元人民幣，國家級高技術企業的數量增加了3萬家。截至2024年，大灣區已擁有超過7.5萬家國家級高技術企業。這些企業中包括華為、騰訊、比亞迪、美的和格力等科技領軍企業，它們在全球範圍內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在價值創造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不僅數量增加，而且其營收和市值也大幅提升。例如，在最新《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粵港澳大灣區共有22家企業上榜，其中中國平安位列第53位，營收達到1,457.6億美元。此外，比亞迪在2023年的營收比上一年增長了221億美元，帶動其名次上升了69位。這些資料表明，大灣區企業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不斷增強。

關於產業分佈，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結構正在不斷優化升級。珠三角地區是製造業的主要聚集地，形成了多個領先的產業集群，如汽車、醫藥和耐用消費品等。廣州、深圳和香港等地則在金融、軟體和房地產等領域表現突出。

根據廣州市發展改革委發布的《廣州市產業地圖》，廣州各大產業的聚集資訊得到了詳細盤點，進一步明確了重點產業的空間分佈。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和數位創意產業在廣州市有較高的企業集中度，分別佔86.5%、81.8%、87%和89.2%。同時，廣東省在工業機器人和服務機器人領域表現突出，已成為中國最具實力的機器人產業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大灣區的製造業基礎雄厚，但整體上仍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附加值和利潤率偏低。目前大灣區各城市發展仍面對以下難點：

- **服務化趨勢不明顯**：我國產業仍偏重於生產製造環節，在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中長期處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導致製造業效率很難提高，利潤率隨之走低。
- **產業結構同質化**：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在電子產品、機械、汽車等領域的工業結構趨同，導致區域空間生產效能難以提高。產業競爭大於產業互補，分散了資金並降低了效益，造成生產能力的閒置和浪費。
- **外向型經濟特徵明顯**：珠三角地區經濟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徵，第四次全球產業轉移和中美貿易摩擦削弱了珠三角製造業企業的競爭優勢。
- **創新能力不足**：儘管深圳的研發投資佔GDP的比例較高，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整體創新水準仍存在差距，特別是在核心硬體製造和生物醫藥領域，依賴進口原材料和技術。
- **研發投入不足**：港澳兩地的服務業發展令實體經濟受到擠壓，企業缺乏足夠的研發投入。例如，香港本地研發支出僅佔生產總值的0.73%，澳門的研發投入強度則趨近於0。

大灣區未來的發展重點在於協調各城市之間的發展，取長補短，尤其是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例如，深圳的科技創新產業已經達到了世界領先水準，並且「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連續四年排名全球第一。總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發展現狀顯示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和巨大的發展潛力。隨著政策支援和區域合作的不斷深化，大灣區有望在未來繼續引領中國的經濟高品質發展。

4.2 大灣區企業戰略發展挑戰洞察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宏偉藍圖下，企業戰略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局面。隨著區域一體化的深入推進，企業不僅需要把握政策紅利與市場機遇，更需深刻洞察並應對一系列戰略發展的挑戰。從市場競爭加劇到產業升級壓力，從人才爭奪戰到科技創新的迫切需求，從跨境合作的複雜性到資料跨境流動的安全挑戰，每一個環節都考驗著企業的戰略智慧與應變能力。因此，如何精準定位自身發展路徑，構建核心競爭力，

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大灣區企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為了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大灣區企業蓬勃發展的內在動力與外部環境，本報告精心挑選並深入走訪了大灣區內多家極具代表性的企業。通過與企業高層的深入交流及實地考察，我們細緻剖析了這些企業在快速發展過程中所捕捉到的獨特機遇，同時也揭示了它們所遭遇的複雜挑戰。這一過程不僅增進了我們對大灣區企業生態的深刻理解，也為未來區域經濟的持續繁榮提供了寶貴的洞察與啟示。

表4：企業關注領域及觀察要點

關注領域	實際觀察要點
營商環境	規則銜接與協調 跨境資金流動與融資 跨境貿易與物流 信息不對稱與溝通障礙 內部差異與不平衡發展
稅收政策	稅收政策合規性挑戰 稅收政策複雜性挑戰 區域差異性帶來的挑戰 「自行判別、申報享受」模式的合規風險 稅務籌劃不當的風險
人才政策	政策解讀與應用挑戰 稅務籌劃與風險管理挑戰 人才引進與留任戰略挑戰
財政補貼	優惠政策門檻高及操作難度大 大灣區內優惠政策爭取引發多方矛盾
跨境資金運用	效率低：資金分散且各國外匯政策不一，致使境外基金存貸雙高 風險大：屬地員工管理和操作缺乏事前和事中管控；外幣匯率大幅波動，缺乏統一風險管控和對沖手段 融資難：難以從當地金融市場迅速、便捷地獲取融資支持
企業出海佈局	目標市場定位不夠清晰 市場進入策略選擇困難 行動進度難以掌控 海外運營協同機制不完善 供應鏈規劃缺乏整體考量 合規風險持續上升 數字化管理效果亟待提升
區域產業協同	產業資源整合與壁壘破除 投資驅動模式的局限性 創新資源分配不均 高質量發展的挑戰 區域協調發展難度增加
資料跨境流動	數據安全合規性提升需求 跨境數據流動合規國際認可問題 政策與標準的明確性與執行力 企業跨境數據流動知識與準備不足 區域間數據流動協調機制缺失 國際數據流動標準與國內規定的對接

4.2.1 營商環境跨域協同與國際化提升挑戰

2023年12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發布《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強調了大灣區作為開放高地和經濟引擎的戰略地位。該計劃旨在三年內構建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制度，推動共商共建共享機制的順暢運作，使大灣區營商環境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從而充分激發市場和社會創新活力，提升區域互聯互通水平，並強化全球資源要素的集聚與配置能力，確保大灣區在全球營商環境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

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政策導向明確、數字化轉型加速、法治保障強化、人才爭奪激烈等多元背景下，大灣區企業在營商環境優化上正面臨著挑戰。

表5：大灣區企業營商環境所面臨的重點挑戰

方向	具體內容
規則銜接與協調	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套法律體系等特殊情況，導致企業在營商過程中需要面對不同規則之間的銜接與協調問題。而跨境合作中的法律、金融、稅收等規則差異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和風險。
跨境資金流動與融資	儘管港澳地區的金融市場發達，但資金流動到內地的限制較多，影響了企業的融資效率和成本，企業亟待探索更多的融資渠道和方式。
跨境貿易與物流	例如在物流效率、通關環節上，潛藏在其中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增加了企業運營成本和風險，企業希冀在物流上實現降本增效。
信息不對稱與溝通障礙	粵港澳三地信息共享建設仍未成熟，企業需要更加有效的政企、協企等溝通機制，以此來提升企業決策效率和運營水平。
內部差異與不平衡發展	大灣區內各城市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存在較大的差異，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刻不容緩，為企業提供一個更加平衡的營商環境。

資料來源：企業訪談、互聯網資料整理，畢馬威分析

除了以上挑戰外，本次報告的許多受訪企業還在國際化與標準接軌、政策優惠支持、高效政務服務、完善法治環境以及人才與技術支持等方面積極表達出了發展訴求。

案例 寅境科技一大灣區元宇宙浪潮的年輕領航者

廣州寅境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寅境科技）是一家由畢業於國內外頂尖學府、有多年谷歌核心團隊以及自動駕駛核心團隊的經驗所組成的新銳企業。「我們在2019年7月落戶廣州南沙，並與南沙開發區管委會簽訂《項目投資協議》。作為一家初創型企業，政府部門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其實對於我們公司早期的成長是有非常大的幫助的。」寅境科技介紹道。

廣州南沙在2022年10月推出《廣州南沙新區（自貿片區）推動元宇宙生態發展九條措施》，其中提出：對具有重大科技創新支撐作用的元宇宙科研平台落地，給予每個平台最高2億元資金支持，對集聚區內的元宇宙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最長3年的免租場地。「元宇宙九條」將有助於相關產業形成集聚效應，打造元宇宙先行先試應用場景。

同年12月，寅境科技在歷經三年技術沉澱後正式發布了全球首個端雲融合的XR/AR元宇宙平台MirrorVerse。該平台擁有“MirrorScene”、“MirrorSpace”及“MirroSuite”三大模塊，全面覆蓋室內、室外及多移動端三大空

[2]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ndrc.gov.cn)

間場景。宸境科技表示，MirrorVerse將會在文旅、商業、娛樂、園區建設、空間規劃、數字政務等應用場景中大放異彩。

近年來，宸境科技已經打造出多個中國第一的元宇宙基礎設施及示範應用，包括：中國首個城市級的鏡像世界元宇宙數字基座、與中國移動、SK中國聯合打造中國首個元宇宙空間智能示範區、中國首個元宇宙政務大廳等^[3]。「除了立足廣州南沙外，我們認為香港在整個大灣區發展中也擁有獨特的優勢。作為我們公司未來『走出去』計劃的一部分，未來會考慮利用香港對標國際市場上的各項優勢，和香港數碼港、科學院等機構或組織尋求像是融資、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並在香港建立起我們的辦公室。」

「在謀求合作時，我們也曾遇到不少問題。像是大灣區不同地區之間對於科技產業的配合度等因素其實都是不一樣的，這就導致了可能在某一地區的合作流程比較繁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參與的積極性。」宸境科技同時指出，「另一方面，像是粵港澳大灣區這樣的城市群，若想吸引更多企業前來駐足，除了離不開政策方面的鼎力相助，在資源配套方面也需要給予企業更多支持。通過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大灣區才有更多機會吸引國際資源和人才。」

在宸境科技看來，新的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正在大灣區鋪展開來，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戰略性產業和未來產業在南沙乃至整個粵港澳地區實現加速崛起，同時也為企業發展帶來了絕佳機會。「南沙以其前所未有的政策魄力，正在吸引越來越多像宸境科技這樣年輕的初創型企業和技術團隊加盟到其中，我們相信南沙將會成功打造為『大灣區的青年活力之城』。」

4.2.2 稅務政策合規與差異化管理挑戰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企業的涉稅訴求也愈發繁雜多樣，其中高新技術企業、製造業企業等類型的企業在生產、研發、銷售等環節的涉稅需求較多，金融、房地產等類型的企業在跨境業務、並購重組等方面的涉稅需求較多。而粵港澳大灣區通過制定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明確各區域發展方向和重點任務，為區域內企業和產業發展提供有力保障，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多舉推行不同維度層面的稅收政策，涵蓋了三大自貿片區（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及深圳前海）以及河套片區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個人所得稅優惠、減稅降費、涉稅服務一體化、跨境稅務服務等多個方面，全方位助力企業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在稅務方面面臨的挑戰主要包括稅收政策的合規性、複雜性和區域差異性。具體來說，粵港澳大灣區包含三種不同的行政體制（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以及不同區域的稅制，由於稅制的差異性，增加了企業稅務管理工作的難度。另一方面，廣州南沙、珠海橫琴、深圳前海、深圳河套的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備案管理採取「自行判別、申報享受、相關資料留存備查」方式：企業根據經營情況以及規定自行判斷是否符合優惠事項規定的條件，符合條件的可按規定時間自行計算減免稅額，並通過填報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享受稅收優惠。同時，按規定歸集和留存相關資料備查，因此對落戶企業的合規性帶來一定的挑戰。如果出現稅務籌劃不當的情況下，企業將面臨稅務調整或處罰。以上情況都將給企業落戶大灣區帶來一定的障礙，企業需要提前從規劃、落地實施、日常管理等全方面做好準備工作，以便於更好地適應大灣區市場發展。

案例 華潤廣東醫藥－「港澳藥械通」引領灣區健康未來

華潤廣東醫藥有限公司（下稱：華潤廣東醫藥）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覆蓋九市二區，人口基數與流動人口總和接近一億，如此龐大的人口規模使得健康與醫療需求尤為迫切。因此，在醫療藥械的流通過程中，對流通端——即藥械生產端與使用端之間的關鍵環節，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

華潤廣東醫藥作為華潤醫藥集團有限公司的旗下企業，依託香港總部的強大支持，在我國三大醫藥進口

[3] 宸境科技浙江總部落戶拱墅，杭州網，https://hznews.hangzhou.com.cn/chengshi/content/2023-11/16/content_8644397.htm

口岸之一的廣州口岸中，年進口額高達到百億人民幣以上的規模。作為大型央企，華潤廣東醫藥不僅佔據著優越的地理位置，更在進口醫療藥物器械的緊急使用和特殊海外採購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獨特的實踐成果。

該公司介紹道：「作為2021年大灣區唯一一家臨床急需進口藥械試點代理商，我們深知肩負的責任與使命。我們全力以赴配合政府相關部門，對大灣區內臨床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進行採購、進口、配送、儲存與使用，並實行全方位、無死角的監管。我們嚴格把控進口藥品和醫療器械的來源合法性，確保儲運過程規範、安全，同時保證流向清晰可追蹤，使用環節符合規範。我們的目標是為大灣區民眾提供高效、安全、可靠的醫療服務，守護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

借助試點期間的工作資質，華潤廣東醫藥積極推動了「港澳藥械通」政策的實施，該政策允許大灣區內地九個指定醫療機構使用臨床急需、已在港澳地區上市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從2020年11月至今，華潤廣東醫藥已經通過「港澳藥械通」進口接近30種藥品、醫療器械，並覆蓋廣東19家醫院享用此政策，成功幫助超5,000多位患者。

「如果說『港澳藥械通』是大灣區『請進來』的代表性政策，那麼華潤廣東醫藥作為流通企業，下一步將計劃推動醫藥器械『雙循環』政策實施，幫助我們內地優秀的醫療產品『走出去』。這一舉措不僅有助於滿足港澳地區同胞對高質量醫療產品的需求，更有望將我們的優秀醫療產品推向國際舞台，惠及更多國家和地區的民眾。」該公司談及未來發展方向時如是說。

「與此同時，作為大灣區醫藥流通企業的代表之一，在各類統計口徑中像華潤這樣的流通企業並不算作產業，而是被認為是服務業。我們可能無法享受到政策優惠、扶持（例如稅務優惠）等。當這一狀況延伸到行業時，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灣區部分開拓型企業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該公司強調，企業同樣期望在政策方面獲得更為詳盡且全面的解讀。當前，企業在學習政策方面所付出的成本相對較高，而對於政策能夠帶來的潛在紅利卻知之甚少。特別是對於大灣區內的中小企業而言，他們渴望政府能夠深入挖掘並發揮他們的潛在優勢，從而助力其更好地發展。這樣的政策解讀和扶持對於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和促進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該公司表示：「我們熱切期望政府能夠在政策佈局上實現更加精準的定位、施策和扶持，從而構建行業的良性循環。通過這樣的政策導向，我們希望能夠促進企業形成集聚效應，共同推動行業的發展，並有效避免惡性競爭的產生。」

針對政策惠企，該公司提出了下一步的行動計劃。「近期，我們將積極參與推動『港澳藥械通』的立法工作，將這一原先的綱要、辦法逐步轉化為具備法律效力的模式，確保各項工作有法可依。此舉不僅有助於規範『港澳藥械通』的進口藥械產品市場，更能進一步提升廣大患者對這些產品的健康信任度，為公眾的健康福祉貢獻積極力量。」

4.2.3 人才引聚與個稅優化管理挑戰

自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以來，大灣區與港澳地區逐漸拉平稅收差異、降低境外人才的實際稅負水平、減輕企業用人的成本負擔，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已成為大灣區招才引智、促動人才交流協作的重要政策支撐。個稅不僅僅關乎個人，還關乎企業。在實操層面，各地稅務機關如果洞察到涉稅風險時，往往趨向於先尋求企業的協助以更快、更有效地了解並解決相關問題，這對於企業的個稅風險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業需要加強相應的風險管控意識。經企業調研，我們觀察到大灣區企業享受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時面臨著以下需求或難題：

- 如何提升對個稅優惠政策的解讀與應用，為港澳與外資員工提供所在行業內能申報的最優的個稅方案。
- 如何建立更為合理的稅務籌劃和行之有效的監督管理手段，以確保在引進港澳與外資人才時能夠合法合規地享受稅收優惠，避免因稅務問題而引發的風險。
- 結合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如何制定配套的人才引進和留任戰略，為港澳人士和外資人士提供更好的職業發展機會和福利待遇。

案例 希瑪眼科—打造醫藥器械創新生態圈

香港希瑪國際眼科醫療集團（下稱：希瑪眼科）在香港擁有成熟的醫療體系，憑藉其在眼科醫療領域的深厚積累和卓越實力，自2012年創立以來，希瑪眼科迅速崛起，在業界嶄露頭角，先後在香港的旺角、元朗、沙田等繁華地區設立了眼科中心，為廣大患者提供了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2013年，希瑪眼科積極響應國家政策，依託《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開始在大灣區的展開戰略佈局。深圳福田的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的成立，標誌著希瑪眼科正式進軍內地市場，開啟了公司發展的新篇章。隨著國家對醫療事業的持續關注和投入，2019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意見》，鼓勵發展高水平的醫療機構，為香港醫療企業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在這一背景下，希瑪眼科作為坪山區與香港深化合作的重點項目之一，成功進行了簽約，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大灣區醫療市場的地位。

「明顯的區位優勢、雄厚的經濟實力、集聚的創新要素、領先的國際化水平、良好的合作基礎，這些優勢共同構成了大灣區在全球競爭中的獨特地位。」談及大灣區對香港企業帶來的機遇時，該公司深感大灣區在多個維度上展現出了顯著的競爭力：「大灣區在我國『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重要地位，高度發達的經濟、文化、科研等條件讓粵港澳三地及珠三角九市打通了對外開放的窗口。」

「希瑪醫療集團作為一家香港及大灣區領先的連鎖專科醫療集團，我們在推動兩地醫療融合方面有先行優勢。在業務上，我們採取『眼+口』雙專科戰略，充分發揮品牌以及專家優勢，積極打造『港澳藥械通』差異化競爭優勢；在發展上，我們加速推進深港醫療融合，持續精細耕作灣區市場，並聚力科研及成果轉化，ok鏡研發、製造，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設立『希瑪藥械研發中心』等，以科技創新賦能產業高質量發展。」

在介紹希瑪醫療集團的發展機遇之餘，該公司也針對行業部署作出了自己的見解：「作為一家醫療企業，我們希望未來大灣區能夠進一步簡化引進手續，縮短審批流程，人才引進的手續和審批流程，並制定一個集中審批的機制，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醫療人才引進打造一個綠色通道；其次，放寬對國際醫療人才的認證通道，通過給予適當補貼引進更多先進優秀人才；此外，在開通香港高鐵段後縮短通關時間以及進一步加大稅務優惠也是讓大灣區吸引更多優秀港企入駐的有利條件。」

「政策文字看似簡單，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需要深入挖掘其內涵，並諮詢相關部門的專業意見，以確保政策能夠得以有效落地。企業需要全面了解政府的規劃和定位，並深入探究政策背後的底層邏輯，這樣才能更好地利用政策資源，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持。」該公司補充道。

希瑪眼科認為，內地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香港企業若想在其中立足並謀求發展，必須積極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和客戶心態，努力尋求差異化競爭優勢。在廣告和價格戰等營銷手段層出不窮的當下，香港企業更應堅守自身特色，同時靈活調整策略，以滿足兩地客戶的不同需求。未來，希瑪眼科將大灣區視為創新發展的核心陣地，致力於醫藥器械領域實現產學研的深度融合，並不斷提升服務質量，持續鞏固和拓展在內地的市場份額。

「香港在國際化視野和人才資源方面具備顯著優勢，因此加強兩地間的溝通與協作至關重要，這將有助於企業更好地應對內地國產化趨勢及產業出海的迫切需求。」該公司認為：「當前企業面臨的主要挑戰在於如何將香港的專業服務精準對接市場需求，提供高性價比的高端服務。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將持續探索創新路徑，強化兩地資源的互補與整合，以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為患者帶來更加優質、高效的眼科醫療服務。」

4.2.4 企業科創激勵策略挑戰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五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內軟硬聯通正不斷拓展，科創產業加速發展，青年英才齊聚共創，粵港澳三地數據、資金、人才等科技要素加速流動。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已擁有超過7.5萬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連續四年排名全球第二^[4]。憑藉協同創新的獨特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正加快打造中國科創高地和經濟發展超級引擎，在全球科技競爭浪潮中嶄露頭角。

我們觀察到，近年來，大灣區重點面向電子、機械、汽車等領域開展創新研發，高質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企業」在科技創新中佔有主體地位，廣東全省約90%的科研機構、90%的科研人員、90%的研發經費、90%的發明專利申請都來源於企業^[5]。為了進一步激發企業的創新發展活力，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實施了一系列針對高新技術企業的補貼和財稅優惠政策，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些優惠政策來支持和促進企業的創新及研發活動，是企業需要積極思考的問題。

一是優惠政策落實門檻較高，一些企業雖然已擁有核心技術知識產權，但由於研發費用總額佔收入比例不符合規定要求，未能享受到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另一方面，雖然有多種補貼、稅收優惠政策，但企業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會遇到申報流程複雜、資料準備繁瑣等問題。

二是大灣區內的企業為了爭取當地適用的優惠政策，可能會產生多方矛盾。例如，在知識產權的落戶和科技人員聘用上，目前，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和科技人員的參與度對內地高新技術企業資質和香港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具有重要影響。另一方面，香港的加計扣除稅收稅務優惠也要求相關研發活動需在香港本地進行。這就導致企業必須在知識產權和科研人才的所在地之間「二選一」，給高新技術企業落戶大灣區進行研發活動帶來了矛盾和障礙。

案例 億航智能—飛行科技普惠智慧城市

202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打造低空經濟、生物製造、商業航天等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一種全新的業態，低空經濟具有高科技主導、高效能運營和高質量發展等新質生產力的核心特徵，發展空間廣闊，是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舉措。億航智能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億航智能）是一家在空中交通（包括載人交通和物流運輸）、智慧城市管理和空中媒體等應用領域的無人駕駛航空器產品、方案以及出海的代表性企業之一。

國務院在2021年2月發布的《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中提出，加強智能化載運工具和關鍵專用裝備研發，構建城市群內部快速空中交通網絡。億航智能立足於該綱要，加大、加快億航自主研發的載人級自動駕駛飛行器系列新技術、新產品的持續研發和應用擴展。4月，億航智能推出「空中交通百線計劃」，計劃於一年內開通一百條UAM航線，初步重點將放在粵港澳大灣區，並逐步擴展到中國其他地區。同年9月，億航智能攜手東部通航在粵港澳大灣區率先打造城市空中交通融合空域運行試點項目。

億航智能正積極投身於大灣區低空經濟的建設事業，並表示，「當前，廣州、深圳等地區的低空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儘管相較國外，國內對低空飛行的接受度尚待提升，但政策層面已在逐步推進，為低空經濟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在研發領域，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市場需求的日益增長，低空經濟領域有望得到進一步加強與拓展。」

[4]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 -廣州市人民政府門戶網站 (gz.gov.cn)

[5] 打造全球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廣東這樣幹！4圖速覽科創關鍵數 廣東省科學技術廳 (gd.gov.cn)

2024年四月，億航智能宣佈獲得由中國民航局頒發的EH216-S無人駕駛載人航空器系統生產許可證。這是全球eVTOL行業內首張生產許可證^[6]，是自EH216-S成功取得型號合格證、標準適航證之後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標誌著EH216-S率先邁入規模化生產階段，也為下一步的商業化運營提供重要保障。億航智能高度重視創新的核心價值，並深信政府能夠通過營造更加靈活的政策環境，有效激發企業投入研發的熱情，引導企業以運營導向為主導，而非僅僅聚焦於彌補短板。

在面對日新月異的新興技術和創新概念時，億航智能呼籲政府轉變固有思維，為企業創造容錯空間，從而培育新的商業模式和產業生態。同時，政府還應積極鼓勵創新、培育創新型人才，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看待創業項目的成功率。在這方面，億航智能對廣州市政府的積極響應給予了高度評價：「廣州市政府展現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動力。當地政策出台迅速且富有針對性，針對低空經濟的基礎建設與規劃已經全面展開，涵蓋了硬件配套、航線規劃、人才資源以及運營模式等多個關鍵領域。我們期待在未來看到更多實質性的進展與成果。」

在產學研合作方面，億航智能明確指出，當前學校和研究機構與低空經濟產業的實際應用之間尚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差距亟待縮小。為有效解決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億航智能強烈呼籲加強產業界與大灣區各地政府、高校、研究機構之間的聯繫與合作，構建更為順暢的溝通渠道，確保教育能夠更精準地服務於產業需求。

此外，億航智能還提出建設性意見，期望香港能夠充分利用其豐富的先進經驗，在大灣區科技創新、成果轉化以及研發授權等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角色。通過精準定位自身在灣區科技發展中的位置，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把握灣區科技發展的每一個機遇，讓飛行科技普惠智慧城市的生活。

4.2.5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全球資金管理新挑戰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海外資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全球化經營的逐步深入，企業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全球經營格局之中。根據2023年中國100大跨國公司名單，上榜14家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的海外資產共計2.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上一年增長8.6%，海外營業收入合計8,575.6億元，同比2022年大幅增長16%。在這一背景下，如何高效管理境外資金，特別是全球資金的優化配置，已成為企業普遍關注且亟待解決的議題。資金作為企業運營的核心要素，對於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境外投資、生產和經營的過程中，由於外部環境與境內存在顯著差異，資金管理往往面臨著一系列挑戰。總體而言，這些挑戰與難點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大類別：

圖2：粵港澳大灣區企業資金管理的挑戰與難點



資料來源：畢馬威分析

[6] 中南局頒發全國首張載人無人機的生產許可證，中國民航局，http://zn.caac.gov.cn/ZN_DQYW/202404/t20240416_223537.html

4.2.6 高水平對外開放企業出海挑戰

大灣區企業在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揚帆出海的過程中，對於海外佈局的每一步都需深思熟慮與精準把控。從長遠的戰略規劃到細緻的執行步驟，再到穩健的落地運營，每一個環節都至關重要，不容有失。報告觀察到，企業在海外擴張的征途上，於規劃、執行和運營三大階段遭遇了七大核心挑戰：目標市場定位不夠清晰、市場進入策略選擇困難重重、行動進度難以有效掌控、海外運營協同機制尚待完善、供應鏈規劃缺乏整體考量、合規風險持續上升、以及數字化管理效果亟待提升。面對這些挑戰，大灣區企業需要以更為全面的視角審視市場，以更加精細化的管理策略應對挑戰。同時，隨著海外企業紛紛計劃擴大在大灣區的業務版圖，大灣區企業在拓展海外市場時，更需審慎佈局，周詳策劃，確保每一步都穩健有力。

圖3：企業出海需考慮的關鍵問題



資料來源：畢馬威分析

4.2.7 大灣區產業協同，資源優化挑戰

作為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龐大的內部市場規模、多元的應用場景以及強勁的科技實力，為各產業的加速發展提供了絕佳的成長環境。近年來，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新材料等科技領域在大灣區扮演的角色越發重要，如何對大灣區內的產業資源進行整合，進一步打破流通壁壘、創新壁壘和人才壁壘，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之一。

一方面，目前大灣區的產業體系主要依靠以投資驅動為主導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可能會帶來重複建設和產能過剩，除此以外，由於主導企業已經佔據市場的相當一部分資源，這有可能會出現創新水平或科技創新成果產業化減慢等等的挑戰，影響科技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如何平衡區域科技創新資源也是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突出挑戰，具體來看，香港、深圳、廣州等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科技創新發展的「主心骨」，把周邊中小城市的優勢資源、高素質人才等要素吸引到自身的科創產業中，有可能導致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之間的不均衡分配，進一步增加區域整體協調發展的難度。

案例 新風天域——共繪大灣區醫療服務新生態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較發達的經濟城市群之一，匯聚了全國乃至國際知名的醫學資源，其得天獨厚的條件吸引了眾多醫療企業佈局於此。新風天域集團（下稱：新風天域）作為其中一家知名醫療集團，依託香港地區優秀的醫療團隊與醫學研究，在大灣區建立了三個醫療中心，為當地居民提供了高品質的醫療服務。此外，新風天域還在大灣區投資興建了兩家億元級別的醫院，其規模之大、設施之先進，遠超北京、上海同級別醫療機構，成為大灣區醫療領域的新標杆。

新風天域在廣州、深圳投資達數十億元的和睦家醫院已然成為中國領先的私立醫院集團之一。自創立至今的26年裡，和睦家醫院憑藉卓越的醫療服務質量和廣泛的網絡佈局，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其醫療服務網絡已覆蓋香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青島、博鰲等多個重要城市，總計擁有11家醫院和24家診所，每年服務患者超百萬人次，外籍患者近十萬人次。

在談及大灣區投資理念時，表示：「近年來，隨著內地藥物集採等政策的實施，治療腫瘤等藥物的成本優勢日益凸顯，這使得越來越多的香港患者選擇來內地接受治療，『港人北上』就醫成為大灣區新潮。新風天域緊跟這一發展趨勢，充分利用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獲益匪淺。」

「在廣州這座醫療資源豐富的城市中，廣州和睦家醫院以其前瞻性的醫療理念和創新實踐，脫穎而出，成為廣東省眾多醫療機構中的先行兵。在2021年，經過官方嚴格的遴選和審核，廣州和睦家醫院榮幸地成為『港澳藥械通』首批指定的五家醫療機構之一。這一榮譽不僅彰顯了醫院在醫療領域的卓越實力，也體現了其在推動醫療創新和服務升級方面的堅定決心。」新風天域介紹道，「通過『港澳藥械通』政策，許多曾經難以獲取的國際新藥得以引進國內，使得更多患者無需遠赴海外就能接受到先進的治療。截至2024年4月15日，廣州和睦家醫院已成功通過『港澳藥械通』政策申請了10種、15批件先進藥品，幫助超過1,000多人次患者。」

新風天域表示，「在人才團隊方面，我們醫院匯聚了眾多業界精英。近90%的醫生曾就職於三甲公立醫院，積累了深厚的醫學底蘊。其中，超過93%的醫生擁有超過10年的臨床經驗，他們的專業水準和實戰經驗均達到了行業的高標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醫師團隊中不僅有具備國外執業經驗的臨床和藥劑科專家，還囊括了來自北京301醫院、協和等知名國內醫療機構的權威專家。這樣一支強大的醫師團隊，不僅有力推動了和睦家醫院專科的持續發展與進步，更確保了患者能夠享受到更加卓越、專業的醫療服務。」

像是新風天域這樣出類拔萃的企業，即使是在大灣區蓬勃發展的背後，也難免面臨著諸多挑戰與困難。「市場差異、多變的市場需求、激烈的資源爭奪以及複雜的跨境運作等問題，都是我們當初所遭遇的嚴峻考驗。正因如此，企業更應該在大灣區的發展浪潮中保持敏銳的洞察力和果斷的行動力，迅速作出判斷和決策。我們需要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在短時間內展現出強大的競爭力和實力，以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避免被淘汰出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大灣區這片充滿機遇與挑戰的熱土上立足，實現更加穩健和可持續的發展。」

新風天域亦深刻認識到政府在大灣區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作用，「政府不僅為我們的投資、規劃、宣傳等方向提供了諸多扶持，還在公司運作等多個方面給予了極大的幫助。這些舉措不僅為我們的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讓我們對大灣區未來的繁榮充滿了信心。」

「同時，鑑於我們深厚的香港背景，我們堅信香港企業應充分利用其獨特的國際化優勢、卓越的品牌知名度、先進的管理系統以及豐富的資源業務網絡。通過緊抓政府引導的新機遇，我們應積極推動企業實現快速發展，充分展現香港企業的競爭力和創新力，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

未來，新風天域將堅定不移地繼續投資大灣區健康相關產業，尤其將癌症治療作為重點關注領域，並將繼續利用大灣區的技術優勢，加快投資健康相關的數字技術，致力於開發患者應用和先進醫療設備。同時，也將加大跨境合作和資源整合的力度，通過合作與共享，不斷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新風天域將始終以滿足大灣區不斷增長的醫療需求為己任，助力大灣區健康產業的繁榮發展。

4.2.8 跨境流動新挑戰與合規挑戰

在數字經濟浪潮奔湧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緊握機遇，率先建設數字灣區，以數字化推動粵港澳多方面的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全球數字化最高水平的灣區。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數據已躍升為新型先進的生產要素，其跨境流動也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活動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為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數據安全有序流動、防範風險，粵港澳大灣區開啟了新範式，於2023年12月發布《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實施指引》，為灣區產業發展賦能。但是目前灣區內的跨境數據在安全、合規、有序、高效流動領域的成熟度尚有待提升，這不僅制約著灣區企業間的交流協作，還阻礙著灣區一體化發展進程。經企業調研，大灣區企業在數據跨境流動方面仍存著以下的疑惑與難題：

- 行業的科研工作通常涉及大量的個人敏感信息與重要數據（如人工智能、生物醫藥行業）。對此，粵港澳三地政府如何嚴格把控數據安全合規的要求；
- 數據從內地傳輸到港澳屬數據出境，企業如何滿足合規要求且得到國際認可。

案例 東亞前海證券－揚帆灣區證券合資新藍海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國開放程度較高、經濟活力強勁的城市群之一，受益於中央政府對該地區資本市場平臺建設、互聯互通以及投融資體系等創新發展給予的有力支持，資本市場得到了蓬勃發展的機遇。

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補充協議十，中國證監會批准在深圳市前海自貿區註冊設立東亞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東亞前海證券）。作為在CEPA框架下獲准籌建的全牌照合資證券公司，東亞前海證券的設立是深港成功合作落地於深圳前海地區的重要項目之一。

東亞前海證券由東亞銀行、前海金控及另外兩家內地公司共同發起設立，其中東亞銀行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為49%，業務範圍為證券經紀、證券承銷與保薦、證券資產管理、證券自營、證券投資諮詢、融資融券和另類投資。該公司介紹道：「在CEPA框架下的港資證券公司有三大突破，分別是港資控股限制、單一牌照限制，以及外資合資限制，中國證監會在CEPA框架下所承諾的對港資開放政策在前海得以全面落實。」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資本市場互聯互通、跨境合作不斷加強，粵港金融機構跨境互設的案例顯著增多」，該公司補充介紹：「我國在前些年逐步取消了證券、基金、期貨公司的外資股比限制，這也極大地提高了外資在大灣區參股或新設合資證券期貨業機構的積極性。」

2023年12月，國家發改委在《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中明確指出「深化深港金融融合發展」，在證券相關方面，支持符合條件的證券機構設立獨資或合資法人金融機構，支持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開展跨境證券投資等業務。

「近年來，東亞前海證券充分借鑑了香港金融業的成熟經驗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逐步將市場業務拓展至全國各地。作為國際性重要的金融機構之一，相比以往的單一牌照、參股外資金融機構，東亞前海證券未來在公司治理、境內外業務協同、跨境數據流動合規治理等方面可能會帶來新的挑戰和變化，這些都不是以往合資券商在監管中會遇到的問題。」

「由於內資券商牌照審批從繁，CEPA框架在吸引外資參與設立證券公司的同時，也成為內資曲線涉足證券業務的一種路徑。」該公司認為，以東亞前海證券為代表的公司獲批，釋放出內地資本市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的信號，放寬外資准入，內資參股合作，多業務牌照優勢明顯。

「另一方面，對於像我們這類合資券商來說，要想真正落地開展相關業務，也面臨著不少難題，比如中外文化差異、股東、團隊磨合等一系列難題。但我們也將會延續大股東東亞銀行穩健的經營風格，尋求做成證券行業中的『百年老店』，東亞前海證券將繼續聚焦於投融資客戶的痛點，將發展目光投入到科技等領域中，今後更重視公司的投資能力和國際視野。」該公司表示對東亞前海證券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

五、大灣區企業發展戰略指南

自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隆重頒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來，粵港澳大灣區的軟硬聯通網路持續拓寬，科技創新產業如虎添翼，青年才俊匯聚一堂，共繪藍圖，一個集居住、就業、旅遊於一體的世界級灣區正穩步邁向既定願景。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璀璨明珠，近年來其產業集聚效應日益凸顯，尤其是在高新技術與現代服務業領域，成功孕育了多個具備國際頂尖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引領行業發展新風尚。

通過深入調研，我們了解到，大灣區作為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其獨特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並存格局，不僅為政府探索制度創新開闢了廣闊空間，更為粵港澳三地的企業提供了無限創意與想像的舞台。眾多企業寄望於大灣區能進一步深化合作，優化規則對接與機制融合，從而推動產業鏈條的精細化佈局與轉型升級。

鑑於此，本報告將聚焦於企業界最為關切的多個核心維度，包括營商環境的優化、稅收政策的激勵、人才政策的吸引力、財政補貼的實效性、跨境資金政策的靈活運用、出海戰略的佈局規劃、區域產業協同的深化發展，以及數據跨境流動的暢通無阻等，旨在為企業提供一個新穎而全面的視角，深入剖析這些領域的現狀與未來趨勢，並據此提出富有前瞻性與實用性的大灣區企業發展戰略指南。我們堅信，這些洞察與建議將助力企業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廣闊舞台上乘風破浪，共繪宏圖。

表6：企業大灣區發展戰略指南圖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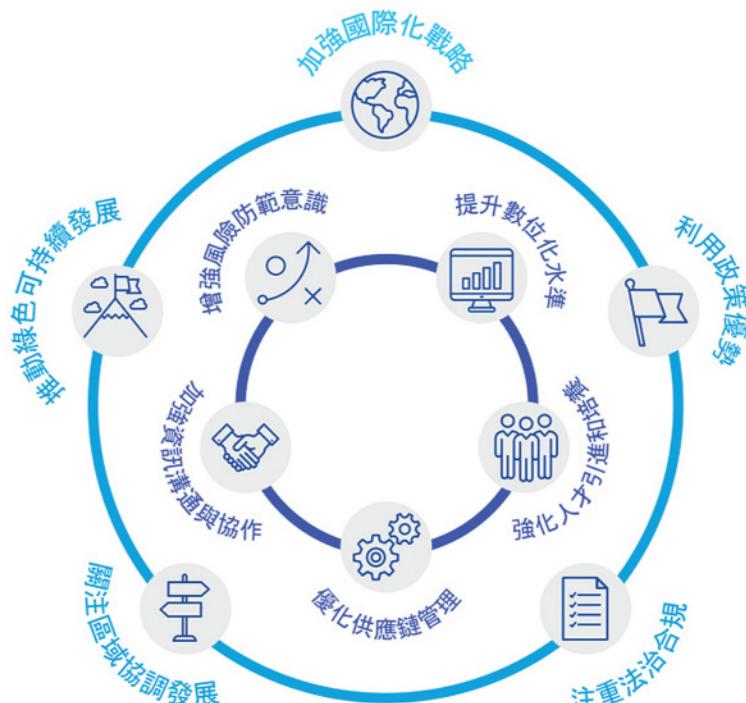
關注領域	企業發展關注重點
營商環境	構建國際化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新藍圖 打造數字化與人才驅動的內部戰略新引擎
稅收政策	進行企業定位與稅務籌劃 開展業務匹配與檢查準備 稅務管理規劃的落地實施
人才政策	立足企業的戰略定位，建立匹配的人才戰略與稅務籌劃 提升內部流程健康自查的能力，建立且完善相應的內部政策 梳理及搭建操作流程 時刻關注風險，保證順利落地實施
財政補貼	加強高新技術補貼政策的理解與利用 優化知識產權與研發布局以跨區域享受優惠
跨境資金運用	設立境外企業財資中心需重點關注戰略願景、業務模式、運營模式等共九大任務
企業出海佈局	目標市場與路徑篩選 產品組合與營銷策略定制 項目全面評估與投資策略調整 風險管理流程優化與稅務合規 海外治理與管理體系構建 供應鏈風險預警體系建設 風險傳導關係梳理與應對策略制定
區域產業協同	根據粵港澳三地不同優勢資源進行優勢互補部署 深港兩地的產業佈局需注意產業選址、供應鏈規劃、科研機構合作等方面
資料跨境流動	關注粵港澳三地政府在跨境數據安全合規方面的要求與措施 在人員架構、制度建設、系統架構、自評管理等多方面提升內部對跨境數據的治理水準

資料來源：畢馬威分析

5.1 構建國際化營商環境典範，激發市場活力與創造力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在營商環境方面既有國際化的需求和高標準接軌的期待，也面臨著規則銜接、跨境資金流動、跨境貿易與物流、信息不對稱與溝通障礙以及內部差異與不平衡發展等難點。為了提升營商環境的整體水平，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加強合作與協調，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高地。

圖4：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營商環境內・外部戰略示意



資料來源：畢馬威分析

關注一 構建國際化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新藍圖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大灣區企業需要構建一個全面且前瞻性的外部戰略框架。這一框架旨在不僅拓寬國際市場、深化國際合作，還要在國內政策紅利的支持下，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和產業的優化升級，進而助力企業實現其社會價值。具體而言，企業應加強國際化戰略，利用大灣區的對外交流優勢，參與國際展會、拓展海外市場，並深化國際合作以提升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力。同時，企業需密切關注並合理利用政府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各項優惠政策，如稅收減免、財政補貼和創新激勵等，以降低運營成本並提升創新能力。在法治合規方面，面對粵港澳三地複雜的法規制度，企業應建立健全的法治合規體系，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合同執行等方面的管理，以確保經營活動的合法性和規範性，並降低跨境經營風險。此外，企業還應關注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各城市的協調發展動態，通過在不同地區設立分支機構、開展合作項目等方式，實現企業在區域內的均衡發展。最後，企業應積極響應國家綠色發展的號召，推動綠色生產和可持續發展，通過採用環保技術、節能減排等措施，降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

關注二 打造數字化與人才驅動的內部戰略新引擎

在快速變化的國內外市場環境中，大灣區企業要想持續發展，內部實力是核心要素之一。以數字化和人才為雙輪驅動，構建高效、智能、協同的內部運營體系，將助力企業在大灣區的發展格局中遊刃有餘。

首先，增強風險防範意識至關重要。隨著大灣區監管制度的加強，企業應建立健全風險管理體系，針對跨境經營、資金流動等風險制定防範措施，並加強內部控制和審計監督，確保經營活動的穩健性和可持續性，同時積極配合地方政府推進「互聯網+監管」體系。

其次，提升數字化水平是提升競爭力的關鍵。大灣區作為科技前沿地區，企業應加速數字化轉型，利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運營效率和管理水平。同時，積極參與政府推動的「數字政府」「一網通辦」等政務服務數字化項目，享受高效便捷的政務服務。

再者，強化人才引進和培養是企業發展的根本。大灣區經濟實力雄厚，企業應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吸引具備國際視野和專業技能的高素質人才。同時，加強內部人才培養和團隊建設，提升員工的專業素養和創新能力，與高校、科研機構等建立合作關係，共同培養符合企業需求的人才。

此外，優化供應鏈管理也至關重要。針對粵港澳跨境貿易和物流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企業應優化供應鏈管理，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通過建立穩定的供應商關係、採用先進的物流技術等手段，確保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最後，加強信息溝通與協作是企業發展的重要保障。大灣區企業應積極與政府、行業協會、合作夥伴等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協作機制，通過參與政府組織的座談會、研討會等活動了解政策動態和市場信息，與其他企業共同應對市場挑戰和機遇。

5.2 優化稅務策略，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

在目前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企業稅務管理顯得尤為重要，有效的稅務管理能幫助企業降低運營成本，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關注一 進行企業定位與稅務籌劃

企業在落戶大灣區時，可考慮實際生產經營需求，明確企業在大灣區的發展方向和戰略定位，根據自身的定位進一步關注政府財稅政策的實質性運營細化指引，並結合大灣區內的產業特點對企業的稅務管理進行合理籌劃。同時，需關注大灣區內稅制的差異，例如要了解珠海拱北、深圳皇崗和廣州南沙三個關稅區的稅制差異，以及香港與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要求，結合實際情況對企業業務佈局及稅務管理做出適當的調整，以此建立可持續的交易模式，為企業長遠業務發展及增長做好準備。

關注二 開展業務匹配與檢查準備

可仔細對照稅務政策中優惠目錄所涵蓋的產業項目與企業的主營業務的匹配度情況，評估可享受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密切追蹤相關細則以及操作指引等配套文件的出台，根據政策要求對業務佈局以及業務模式做出的適當調整，例如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特定封閉區域內發展的戰略性新興企業，能按照規定減按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因此在合作區發展的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這些稅收優惠政策，促進自身的發展和創新。另外，需要重點關注經營過程中對實質性經營、業務真實性及財務數據備查資料準備等方面的具體要求。

關注三 稅務管理規劃的落地實施

企業在制定稅務管理計劃後，可優先考慮落地實施的潛在問題，如落地時間、人力調配、資源流通等。除此以外，企業應配備稅務專家、流程專家以及數據專家，利用大數據等技術實現規劃落地和數據分析，通過技術手段和人工協作加強會計核算和稅務報告的審查，分析查找稅務規劃落實中的風險點，通過問題快速反應機制，完善後續管理方式。在規劃落地實施後，企業需要做好信息系統升級、稅收數據整理等工作，提升自身的風險處理能力。

5.3 強化人才戰略，打造灣區人才高地

基於4.2.3章節觀察，結合大灣區企業在個稅領域的實際需求，建議大灣區企業可在人才戰略建立、政策制定、流程管理以及落地上採取以下行動，確保滿足稅務合規要求的前提下，充分享受個稅優惠的紅利：

關注一 立足企業的戰略定位，建立匹配的人才戰略與稅務籌劃

大灣區企業需要深入分析行業人才需求特點，結合政府的個稅優惠政策，制定與企業戰略相匹配的人才戰略，明確人才引進、培養、使用和保留的策略，建立一套科學、合理、有效的境外人才引進與留任機制。此外，通過審閱人才架構與人才管理模式，企業應該建立與之相匹配的稅務籌劃，如企業在錄用前期充分了解港澳人士、外資人士個人所得稅的合規要求，並根據要求進行合理的薪酬發放設計或調整，盡可能避免雙重徵稅、降低企業的用人成本，實現人才與稅務成本最優化。

關注二 提升內部流程健康自查的能力，建立且完善相應的內部政策

企業應該輔助港澳、外資員工檢查個稅優惠收入及相關支持性文件的完成性，幫助其梳理歷史數據，及時完成納稅調整。在完善內部政策方面，一方面，企業應該完善港澳、外資員工個稅優惠政策及內部管理流程。另一方面，為以往未享受此個稅優惠政策的港澳、外資員工制定和搭建相關的政策及流程。

關注三 梳理及搭建操作流程

企業應該對個稅優惠政策申報的內部流程管理進行優化和更新，還應定期向主管稅務機關了解具體申報要求並及時完成資料更新和報送。

關注四 時刻關注風險，保證順利落地實施

首先，企業應該加強對港澳、外資員工的個稅優惠相關政策的解讀培訓與溝通，確保其充分理解個稅優惠政策，幫助其申報最優的個稅方案。其次，企業應該關注落地實施過程中的主要考量點，定期審查港澳、外資員工個稅申報實施情況，對流程進行查漏補缺，提升效率。

5.4 精準財政補貼，助力產業升級與創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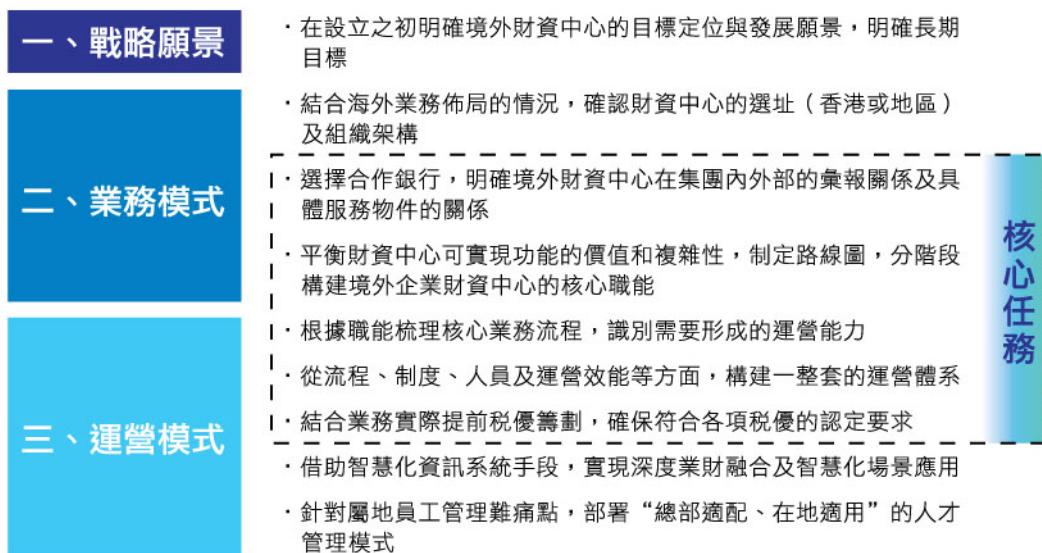
企業應加強對高新技術補貼政策的了解和利用程度，在申報流程中注意確保符合相關要求，避免因不符合條件而影響優惠政策的享受，定期關注政策動態和申報指南的變化，及時調整策略，以及時享受到最新的政策優惠。

另一方面，企業可以結合香港和內地在知識產權及科創方面的優勢，在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內各設立一家企業共同研發，其中一家公司持有且在大灣區內選擇一地登記知識產權時，兩地政府可將該企業一起認定該知識產權，可以在兩地都享受相關優惠。

5.5 靈活跨境資金政策，促進資本自由流動

報告觀察到在香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CTC）是應對4.2.5章節中提到的挑戰與難點的理想實踐。從實際操作來看，設立境外企業財資中心需重點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九大任務。

圖5：設立境外企業財資中心需重點關注的九大任務



來源：畢馬威分析

從為企業帶來的價值來看，在降低資金使用風險方面，通過將企業全球化公司賬戶的監督集中在香港，可使企業能夠改善其業務部門的財務治理，這是有效緩解各種金融風險的關鍵，包括流動性風險、資本安全風險和交易對手風險等；在降低稅務負擔方面，香港CTC符合相關規定，使用更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即8.25%（標準稅率為16%），此外，其向海外相關公司支付的利息可在特定條件下扣除；在提高資本效率和增加收入方面，在香港建立CTC使公司受益於香港穩定的外匯環境和美元匯率，降低借貸成本和外匯費用，提高資本效率和回報率。

5.6 佈局全球出海戰略，拓展國際市場版圖

為成功應對海外市場拓展的挑戰，企業需從以下核心方面進行全面規劃與佈局。首先，需進行目標市場與路徑的篩選，深入分析潛在市場的政治、經濟、文化風險，精準確定最具發展潛力的市場及最適宜的進入路徑。其次，根據目標市場的具體需求，定制產品組合，制定有效的營銷策略和渠道規劃，以提升市場適應性和營銷策略的執行效果。同時，企業還需對項目進行全面評估，確保投資的高效落地，綜合考慮行業、地域、時間等因素，靈活調整投資策略。在風險管理方面，企業應精簡流程，強化稅務合規，關注稅務優惠，確保供應鏈涉稅事項的合規性。

此外，建立穩固的海外治理與管理體系，確保業務的安全穩定，並實現供應鏈風險的全生命週期管理。為了有效管理海外供應鏈風險，企業應構建覆蓋全鏈路的風險預警體系，保障供應鏈的順暢運行和可持續發展。最後，企業應全面梳理風險傳導關係，進行多維度的風險評估，並據此制定有效的應對策略。通過這些綜合措施的實施，企業將能夠更穩健地推進海外市場拓展，實現其國際化佈局的宏偉目標。

5.7 深化灣區產業協同，構建協同發展新生態

關注一 根據粵港澳三地不同優勢資源進行優勢互補部署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的增長，粵港澳三地的科技創新成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動力源。目前粵港澳三地在科技發展方面存在科技資源、科學技術等的差異。針對三地差異化的問題，企業應該深入了解粵港澳三地各自的科技發展策略、優勢領域和資源配置情況，並利用三地各自的優勢資源，如深圳的科

技創新實力、廣州的產業鏈完善、香港的國際化視野和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等。通過合作、合資或共建研發中心等方式，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

在推動大灣區創新資源深度協同，提升科技創新要素的集聚能力的背景下，企業需：一是探索「技術+產業」的雙輪驅動模式，粵港澳大灣區正以關鍵技術研發為核心使命，打造科學研究和成果轉化於一體的大灣區科技創新樞紐，各地企業可聚力開展關鍵技術攻關、技術熟化、樣機開發等，為科研成果的轉化作出貢獻。二是加強智能製造的應用，智能製造可以有效促進產業和資源要素深度融合，企業可建立健全標準化工作體系，把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運用在產業中，同時打造信息分享平台，實現大灣區各地的科技信息資源共享。

關注二 深港兩地的產業佈局需注意產業選址、供應鏈規劃、科研機構合作等方面

深港兩地經濟帶的發展潛力巨大，每年可創造數千億級的經濟產值，並引領周邊地區高質量發展。近年來，深港兩地的產業佈局經歷了顯著的升級和互補，企業尤其要注意產業選址、供應鏈規劃以及科研機構合作等方面的變化和發展。

在產業選址方面，企業首先要考慮地理位置以及交通便利性，例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位於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靠近香港，具有地理上的優勢。其次，企業還需要考慮當地的產業基礎以及配套服務設施，例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通過跨境接壤和政策體系協同，為高科技研發型公司和高端製造業提供了優質的產業環境。最後，企業需要關注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和合作機制，例如，國務院發布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提出了多項優惠政策，目的是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創新載體和頂尖科技企業研發中心。

在供應鏈規劃方面，深港兩地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跨境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和專業服務等多個方面的努力，正逐步構建起一個高效、智能、開放的世界級供應鏈體系。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擁有充足的國際市場資源，深圳的企業可以合理利用香港的國際化資源，增強供應鏈服務出海能力、建設大宗商品供應鏈體系等，提升兩地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在科研機構合作方面，深港兩地在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等領域均有突出成果，這有助於推動深圳與香港的科研合作和成果轉化，深港兩地的科創企業可以建立項目管理溝通部門和成果分享平臺，促進企業間的合作和信息共享，進一步提高兩地科研人員的跨境流動效率以及創造更好的科研交流環境，吸引更多的科研人才與機構落戶深港合作區。例如，深圳的高科技企業在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領域與香港展開合作，利用香港的臨床試驗優勢和深圳的高端醫療器械生產鏈條，加速了研發進程並降低了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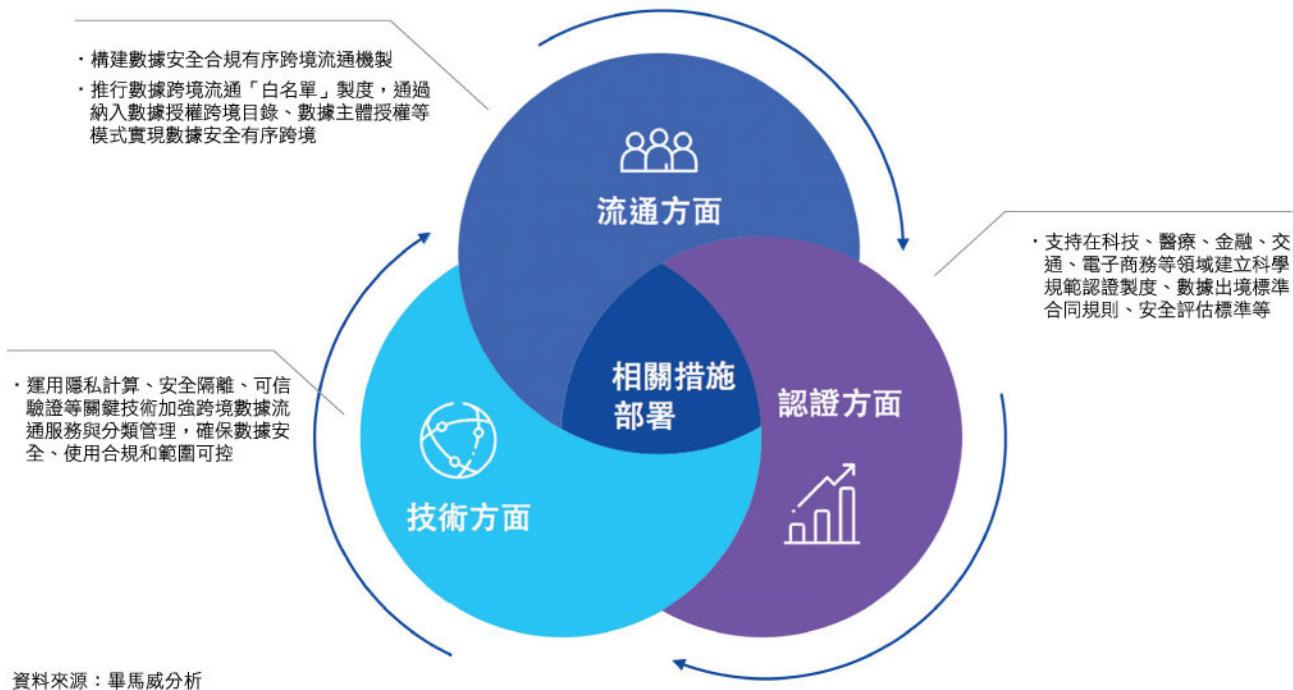
5.8 保障資料安全，暢通資料跨境流動渠道

跨境數據安全合規與保護工作關乎企業運營的各個環節，聚焦重點、有序實施對提升企業跨境數據安全維護能力至關重要。基於對監管要求的梳理和解讀，我們總結出大灣區企業在跨境數據流動時需要注意的以下事項：

關注一 關注粵港澳三地政府在跨境數據安全合規方面的 requirements 與措施

當前，粵港澳三地對數據處理合規標準的規定不盡相同，這種差異可能導致大灣區內的數據處理行為面臨不同法律評判，一些數據處理者可能因缺乏充分的認知而違法。因此，大灣區企業需要時刻關注粵港澳三地政府在跨境數據安全合規方面的政策動態，積極與監管部門就數據出境的監管要求進行溝通，通過交流深化對數據跨境法規中關鍵概念及行業監管重點的認識，保證自身在進行跨境數據傳輸時符合監管要求。粵港澳三地政府正努力在數據流通、技術、認證等方面部署相關措施把控數據安全合規的要求。

圖6：粵港澳三地政府把控數據安全合規要求的部分措施



關注二 多方面提升內部對跨境數據的治理水平

大灣區企業可以通過人員架構、制度建設、系統架構、自評管理等方面逐步提升內部對跨境數據的治理水平，確保數據的合規性和安全性，為企業的國際化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 在人員架構上，建立數據管治團隊。提升灣區內的數據管治的團隊規模，牽頭開展數據跨境合規工作，逐漸建立數據合規管理能力，為相關工作人員提供培訓和溝通。
- 在制度建設上，迅速構建數據跨境管理制度和流程，如數據出境清單模板、數據出境自評流程、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申請流程、數據出境標準合同模板以及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流程與模板。同時，確保這些流程與系統架構中的平臺緊密結合，提高數據跨境管理的自動化水平。
- 在系統架構上，審查內部系統在遵守數據跨境法規方面的差距，例如數據訪問控制、網絡安全措施。當系統涉及大量的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時，應優先實施數據本地化整改策略，並強化數據跨境管理的技術控制手段，以確保數據的安全性和合規性。
- 在自評管理上，快速梳理數據跨境各個場景（尤其涉及個人信息與重要數據），並對跨境數據進行安全自評估。基於評估結果，對發送方與接收方實施管理和技術整改，包括數據分級分類、最小化收集、去標識化、加密存儲傳輸、強化訪問控制等。

圖7：建議的風險自評估範圍及內容

建議的風險自評估範圍		建議的風險自評估報告主要內容
目的、範圍、方式評估		
合法權益風險評估		
安全保障能力評估	• 出境過程和出境後數據安全風險管理 • 對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權益保障 • 接收方安全技術和管理能力	• 數據處理者（發送方）所有權結構 • 數據接收方主體資格和政策法規環境 • 出境規模、範圍、種類、敏感程度 • 合法性、正當性、必要性
合同合規性評估		• 數據處理者（發送方）網絡安全能力 *確保數據生命週期保護的能力 • 數據接收方網絡安全能力 *安全管理技術能力
歷史違規記錄評估		• 合同約束 風險評估
接收方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政策法規和 網絡安全環境		• 與境外接收方擬訂立的數據出境相關 合同或者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如：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
		• 該部分屬於國家網信部門安全評估範圍，建議在風險 自評估階段完成內部自查和應對準備，以在安全評估 階段可應國家網信部門要求提供相關信息

資料來源：畢馬威分析

粵港澳大湾区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ER
BAY AREA

結語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與香港關係最密切的國家戰略之一，是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變量。我們對於大灣區的理解，應該要有戰略性思維；對於大灣區的發展，應該要有探索性實踐。立足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五周年的時間節點，我們既可以回溯大灣區的發展軌跡，更透徹了解大灣區的戰略方針，也可以透過諸多實踐案例，檢視大灣區發展所創造的機遇以及所面對的難點，並從而提供高瞻遠矚的建議及踏實可靠的指南。

從大灣區規劃中理解國家戰略思維，是大灣區發展的核心。我們經常提到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做的不只是走進內地、加強交流，更重要的是理解何謂國家發展的「大局」，也就是國家發展戰略。當「大灣區」成為國家戰略後，其概念視野已與傳統的「珠三角」城市群不一樣，由一般的區域城市群，躍升為對標紐約、舊金山和東京等國際頂端的「灣區」。與這幾個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規模已經與其相當，經濟增速快；然而在科技、金融等核心領域，卻尚未像其他幾個灣區般居於全球核心領導地位。因此，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是國家城鎮化發展進入新階段的歷史節點上一項綜合考慮的國家戰略；也是國家隨著綜合實力提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主導重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戰略考量，推動大灣區建設成為在全球經濟體系中處於核心領導地位的區域。

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提出亦有意紓解香港單靠自身難以處理的深層次矛盾，推動香港長遠發展。「粵港合作」的意義在不同時期發生了變化：雖然早年香港與內地曾出現「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但後來隨著內地城市發展而出現經濟利益分化，不但難以形成合作，甚而出現競爭關係；大灣區規劃的提出有意在更高的層

次推動新一輪經濟利益整合、創新提升城市群產業鏈分工合作，並在此過程中使香港得以發揮獨特優勢，從而助力香港在新時期的發展。就此，在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兩次提到「粵港澳大灣區」，作出了明確的指示：一是作為區域發展戰略，代表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區域之一，要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用；二是關於高水準對外開放，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國家戰略」、「產業分工」、「香港發展」是大灣區發展戰略的三個關鍵詞。未來我們要一起思考三個問題：一)如何更好地運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使香港能透過參與大灣區發展對接國家戰略？二)如何透過明確不同的功能定位，加強大灣區內不同城市的協調發展？三)如何透過建設合作平台，進一步推動香港與內地城市的協作，並助力香港的發展需要？

回答這些問題不只是政府的責任，在大灣區過去五年的發展經驗中，企業不只是受益者，也是參與者、開拓者。政府層面制定了戰略規劃，設計了政策措施，但在落地協調方面，需要企業的對接推動。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近年來在企業增量、價值創造和產業分佈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未來隨著區域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企業一方面要把握政策紅利與市場機遇，另一方面要深刻洞察挑戰，予以恰當應對。在營商環境、產業升級壓力、稅收成本、人才政策配套、財政補貼激勵、跨境資金及數據流動、政策法規機制等方面，企業界過去五年一邊在探路、一邊在開創，披荆斬棘的實踐努力為我們建設了大灣區一體化的基本格局。

大灣區規劃的第二個五年多了一個關鍵詞：「協作治理」。不論是產業分工，還是機制對接，大灣區在「9+2」的格局下，愈益需要加強不同制度之間的合作，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需要建立更緊密及有效的協作機制。除了政府之間的「G to G」協作外，政府與企業之間的「G to B」協作也是重要一環。政府與企業是大灣區發展的一體兩面，只有雙方合力共同創造，大灣區的願景才可以落實。在協作過程中，政府與企業之間要有更有效的溝通對接，可透過研究顧問機構作為重要橋樑，將政府的戰略視野化作企業的思維框架，將企業的實踐經驗轉化為政策訴求，這也是我們這份報告所示範的成果。

我們希望這份發表於五周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與香港的機遇和挑戰》報告只是一個開始，我們期待接下來的五年在大灣區深化合作及協調發展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實踐成果，並與大家相約在五年後的另一番新景象，作更深入真切的分享交流。

備忘錄



本研究報告之電子版
可透過下列 QR CODE 下載

